

記 憶

REMEMBRANCE

2008年12月14日

第九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本期目录

国史笔谈

[唐少杰](#) 反思和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一大进步

[袁笠翁](#)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下）

抢枪专题

[王广宇](#) 江西红卫兵抢枪和毛主席批示（史林一叶）

[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总支委员会通报](#)（故纸堆）

[刘祖万](#) 紧急！红卫兵涌向军火库（文摘）

[周总理指示](#)（故纸堆）

[张传俊](#) 我所经历的文革抢枪事件（蓦然回首）

[卜伟华](#) 关于文革中的夺枪问题（文摘）

文摘

[王保春、王文耀](#) 陈伯达错捕王广宇

小资料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名单](#)

编读往来

1、[丁东](#)纠八期错误。2、[袁伟时](#)建议超级链接。

【国史笔谈】

反思和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一大进步

唐少杰

2008 年春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发行、该校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八卷（1972—1976），即由史云先生、李丹慧女士合著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不仅在这套十卷本国史关于文化大革命史的三卷文本中举足轻重，而且可谓关于文革后半期的史书，或曰“半部文革史”，显然，这一卷国史在时间上涵盖了文革十年史的后半部分。包括这一卷国史在内的十卷本国史的完成和先后问世，堪称 2008 年中国现代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更堪称在即将到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对于 1949 至 1981 年新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巡视性”的深刻反思。

由学术同仁所主办的电子杂志《记忆》第六期、第七期上发表了丁东、余汝信、阎长贵先生对这一卷国史的评论文章。我个人认为，丁东、阎长贵先生对这一卷国史的评论十分中肯；我要坦率地说，余汝信先生把这一卷国史称之为依然囿于文革研究“旧思维”模式中的“新瓶里的旧酒”，颇为不妥。余汝信先生的批评主要限于这一卷国史对于 1972 年 8 月美国学者维特克采访江青一事的前因后果以及相关评述的问题。然而，在这一卷国史第五章第三小节的“‘红都女皇’之谜”，并不能代表或影响这一卷国史的整体或主体。因为，众所周知，对于“红都女皇”这一事件的确证还有待于更多、更机密的历史档案材料的公布以及相关的细致梳理和严格考证，也更有可能进一步证明和充实余汝信先生本人对于这一事件的深刻分析和论点。

在我看来，对于这一卷国史的准确评价，一方面，应该把它同这一套国史已问世的第六卷（1966—1968 年）即卜伟华先生著的《“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和即将问世的第七卷（1969—1971 年）即高华先生著的《新秩序和新冲突——从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有机地加以联系起来。这三大卷本国史的出版，蔚为壮观，它们毕竟构成或将要构成迄今为止最为详细的评述文革历史的鼎足之势。另一方面，应该看到，这一卷国史与卜伟华先生的第六卷国史、高华先生的将要问世的第七卷国史（其若干观点已在“学术中国”等网站上和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表）一起，标志着在文革故乡，反思和研

究文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与在文革故乡先前的和当下的关于文革历史的著述相比，更是有了在史料整理、史事考证、史识方法和观念批判等等方面新的、质的飞跃，进而，真正表明了中国人自己反思和研究文革现今所达到的水平或高度。

实际上，这三卷本国史，完全可以单独构成一个大部头的文革史，应该加以集结，单独出版、发行。这三卷本国史的作者们，无论是来自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还是来自当代中国史研究部门，无论是执教于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历史学系，还是带有某种自由学者和民间研究者的特点，经过他们的努力，实质上改变了中国学者在文革研究领域远远落后于国外学者（包括华裔学者）的状况，这也意味着作者们为结束那种“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的局面迈出了扎实而可喜的一步。从我目前通读的这一卷国史以及卜伟华先生的第六卷国史所得到的感受，我愈益坚信，中国大陆学者反思和研究文革已从整体上远离甚至“告别”了官方“钦定”的文革论说模式。

概而言之，《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这一卷国史具有以下优点：

一是全书拥有许多独特的见解。这主要表现在对于江青、张春桥在历史上不是中共的叛徒的考证，对毛泽东与“四人帮”尤其是与江青的关系的确证，对邓小平 1975 年“整顿”“不摸脉”的论证，对“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的伪造这种长期流行不衰的说法的否定，对“四人帮”有一个改变计划的否定，等等，在这些方面，这一卷国史为力争使其概述和把握文革的历史成为信史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二是全书提供了不少颇有价值的史料。这主要表现在对于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对于自己的接班人的考虑和筛选问题的梳理，对于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历史反省和 1973 年底因与美国的关系而受到政治局批判之事的辨析，对于 1973 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一事的分析，对于粉碎“四人帮”一事的来龙去脉和相关当事人不同作用的评述，等等，在这些方面，这一卷国史为广大读者纵览文革历史提供了比较广阔而清晰的视阈。进而，若是作者能够更加明确、详细地注明引用或引证的那些重要的或关键的史料的出处，那无疑是锦上添花。当然，我本人也充分理解作者在这一问题上的难处。

三是全书映现出两位作者的可贵的研究风格和著述取向。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既有力地缩小了中国官方文革论述文本中那种“为尊者讳”的通病，又痛切地削弱了在中国文革话语和论域中长期盛行的“为污者讳”的顽症，即“不愿意去洗刷那些事实上并不属于污者的污垢”（第5页）；另一方面，把研究的关注点和著述的切入点不是仅仅限于文革权力上层的范围、文革的政治层面或文革风云人物的变迁，而是相当深切和广泛地涉及到了文革当中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大众心态、社会思潮（包括“异端思潮”、青年读书生活和“地下文学”）以及文革的经济、教育、文学艺术等层面。而所有这些，在突破了过去中国大陆记述文革的话语的呆板、片面以及论及文革的着眼点的单一、狭隘的同时，就完全有可能多层次、多维度、多交叉地“再现”出文革社会历史生活的画面或景观。

四是这一卷国史关于文革外交问题的第二章和关于文革经济问题的第四章，十分突出地显示出了两位作者各自所专长的文革的外交史和经济史的研究及其功力。这两章不仅在史料的运用和数据的整理上做到了翔实和厚实，而且对相关问题的展现和把握也达到了收放自如、游刃有余，并且富有新意地揭示出了文革在外交领域和经济领域所走过的那复杂、多元、曲折的历程。读了这两章，很容易使读者去思考下面两点：文革外交史和经济史与文革政治史既有关联更有不同；文革后期的外交问题和经济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文革政治问题乃至意识形态观念问题的某种解构。

五是全书洋洋洒洒，近六十万字，全书十章的框架大致上是按照时序论及1972至1976年的文革政局、外交、中共党内斗争、经济、军人势力变迁及“批林批孔”运动、四届人大会议之争、文教卫生及异端思潮、邓小平的“整顿”、“批邓运动”、粉碎“四人帮”。全书的结构比较合理，章节安排严谨，条理清晰，绝大多数的论述既没有那种纯学术的抽象色彩，也没有那种历史流水纪年似的平淡气息，而是在不少地方，字里行间，饶有余音，真知灼见，颇具回味。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这一卷国史有几个在史事或史事界定上的错误，具体如下：

第66页上，说“毛泽东的侄女王海容……”应为“毛泽东的表侄孙女王海

容”，王海容是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的孙女。

第 308 页上，称“海军副司令员陶勇上将”，不对，陶勇的军衔实为“中将”。

第 443 页上，讲“交响乐《黄河》等·····”，不准确，应为“钢琴协奏曲《黄河》等”。

第 474 页上，提到“加缪”和“萨缪尔森”的名字，中文习惯用法为“加缪”和“萨缪尔森”。

第 476 页上，提到复旦大学“胡守均”的名字，应为“胡守钧”。

第 600 页上，讲到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把这位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说成是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儿子，不对，戴维·艾森豪威尔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孙子。据悉，20 世纪 50 年代末，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时，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的园地，就是这位总统以其孙子名字所命名的著名的“戴维营”。

我希望两位作者今后在修改这一卷国史时订正上述这些错误，并且衷心祝愿两位作者今后有更多更新的反思和研究文革历史问题的力作问世！

【国史笔谈】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兼与作者商榷（下）

襄笠翁

二、关于立场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追求“客观公正”，因此，史学家在面对历史人物和事件面前，应该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遗憾的是，《难》和作者没有做到这一点，作者无法超然，作品自然就难以客观公正。

第一、偏见

如官史一样，《难》禀持着仍旧是“好人办好事，坏人办坏事；好事都是好

人办的，坏人是不会做好事的”这种观念。这一点在对周恩来的评价上至为明显。

例如，作者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谈到，针对当时的公安部大批人员被怀疑为特务，周恩来气愤地说：“公安部把所有局长的权都夺了，只剩谢富治一个人，还怎么做工作？这是剜心战术。”（第 43 页）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例如——

1、1967 年 8 月 21 日，周恩来对《七机部军管会的指示》中说：“政治部和公、检、法不是一个系统，政治部由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如果要砸，要劝阻；劝阻无效由他们负责。要劝说‘新九一五’的同志不要管，千万不要武斗。政治部的领导干部有缺点错误，可以批判，不要砸。”（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2002 年版）周恩来的言外之意是，公、检、法是可以砸的。

2、1968 年 3 月 18 日，周恩来在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时的就讲：“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伸向浙江的黑手一个个揭发出来，砸烂公检法，文教战线上许多坏事要改造。”（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3、根据余汝信先生的记述：1968 年 4 月 1 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中央领导、中央文革小组报送关于公安部改组情况的报告。主要内容就有：深入开展大批判，截至目前止，共挖出叛徒、特务、走资派和有严重政治问题的重点分子 101 人，逮捕 22 人，群众看管 79 人，其中包括 7 个副部长级干部。指称罗瑞卿、徐子荣、汪金祥等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资敌通敌，里通外国”，“把黑手伸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要继续批深批透，批倒斗臭；四是建议由军队调来的曾威（军级）等四人组成审查清理档案小组，以曾威为组长，再从军队中选拔 150 人，担负审查清理档案的任务。对这个报告，周恩来并没有未表示异议，并转报毛泽东及中央批准。

4、1971 年 6 月，周恩来否决了公安部核心小组要求新设立中央政法干校的要求。李震重建公安队伍的积极态度不是比周恩来更可取吗？（见余汝信，《1973：李震之死始末》，华夏文摘增刊第 376 期·文革博物馆通讯第 213 期，中

国新闻电脑网络 (C N D) 主办 , 2004 年 4 月 19 日出版)

此类事例多有, 笔者不一一列举。在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 可以看到周恩来对公安系统工作的多次诋毁。然而《难》的作者在把谢富治描述成一个恶人的同时, 把周恩来塑造成一个维护公安系统的楷模, 这是有违于史实的。

实际上, 毛泽东在 1967 年会见刚果 (布) 总理努马扎莱时就明确说了: “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 (《毛泽东传 (1949 - 1976)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508 页) “砸烂公检法”正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之一, 作为执行毛泽东文革政策最得力的助手, 周恩来自然对此是坚决执行的。值得注意的是, 《难》“为尊者讳”, 远不止上述一事, 作者对周恩来的曲意呵护在书中随处可见。

官史承认周恩来在文革中说了不少违心话, 办了不少违心的事。而《难》的作者在这方面却连官史还不如, 居然说: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总是表现的‘右’、保守。” (169 页) 笔者不知道作者依据何种资料得到这个结论。资料证明, 周恩来是有右的地方, 但是也有左的地方。究其本质, 周恩来是执行毛的政策最得力的助手, 不仅是在毛右的时候, 也在毛左的时候。 (Teiwes Frederick,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 p12—25; 郭思敏主编《人民总理周恩来》下卷, 红旗出版社 1997 年 9 月版第 1771 页) 然而有时候周在执行的时候并不知道毛的底线如何, 于是在试探毛的时候, 不免会表现为较右或者较左。例如, 1966 年 6 月份, 周恩来指示干部要引火上身。随后不久, 毛泽东提议所有干部都要在运动中表演一下。于是在李富春主持的、陶铸抓的、副总理和各口负责人都参加的会上, 搞出一个“司局级以上干部都要烧一烧”的会议纪要。周恩来阅后, 批示道: “我看这个文件很好, 请文革小组同志阅后送主席。”关锋则在此文件上批: “我看这个文件不好”。王力说: “我是不同意提出干部都火烧的。”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和王力五人联名对此文件表示了异议, 由江青上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此件不发

，退文革小组。（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81 页）当“九一三”之后，毛发现很多人反对文革，需要借纠左来巩固文革时，周在执行的时候并不知道毛的底，也只能试探，当把触角伸向教育思想等敏感领域时，也就被毛制止。（Teiwes Frederick,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 p56—60、111）

对于王良恩之死，明明周恩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者却丝毫不敢提及，相反用大量的笔墨痛斥江青等人（第 314 - 316 页）。笔者认为，造成王良恩之死的关键证据，作者是知道的，但是作者却以“为什么当初林彪会把信扣押下来，他确实不清楚”来为周恩来解脱。（同上）

事实上，1970 年 8 月 25 日，许世友等三人将信写好之后，委托当时担任华东组记录简报工作的华东组会议秘书洪雪竹交给负责大会会务的王良恩，请王良恩转呈毛（赤男《林彪事件后三位上将的信件风波》，《党史博览》2004 年第 6 期）。王良恩接到这些信后，按程序上交给周恩来。然而周恩来却把此信转给叶群，并附条子：到此为止，存你处。（见《舒云采访邱会作》一文，载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明镜出版社 2006 年第 1 版第 121 页）江青的威逼，众人的揭发、落井下石固然是王良恩自杀的主要原因（见丁凯文《王良恩是林彪死党吗？》，华夏文摘增刊第 359 期·文革博物馆通讯第 196 期，2003 年 10 月 28 日出版），但是作为对此事了如指掌的周恩来却未施援手，没有站出来做任何实质性的解释，这也是王良恩绝望的主要原因之一。周恩来为什么不说明他给叶群写的条子呢？

作者对于周恩来的失实描述还出现在不少地方，再举一例。第 112 页“周恩来表现出空前的积极性，几天内旋风般地周游各国将这一情报通报仅有的几个铁杆兄弟”。作者以此来证明周是支持中美建交的。实际上，每次毛的主张要落实，周都是“表现出空前的积极性”。例如作者提到当周得知张再的文章引起毛的震怒时，周也是立即行动起来。这个积极性只能说明周对毛的命令的

执行很快速，并不能表明其他问题。

与对周恩来的呵护备至，褒扬有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者对于“四人帮”的明显偏见。

《难》书第 40 页，作者将 1970 年的 4 月 24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完全归功于周恩来，这是充满偏见的行为。因为无论文章是好是坏，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是张春桥。而作者对张春桥的作用完全视若无睹。

《难》第 41 页谈到毛决定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时，作者竟然用“江青集团更是愤愤不平”来形容，但是同页却又记载了张春桥对上海市委马天水等不同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态度进行了批评。且不论当时的王洪文还不是后来所谓的“江青集团”一分子，更不用说马天水了。更重要的是，江青对此事到底有何反对之举，作者并无证据。而且因为邓小平复出的条件之一就是不能反对江青，在这种情况下，江青如何在 1973 年的 3 月 9 日就开始表示反对了呢？（Teiwes Frederick,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 p72 作者访问国内研究邓小平党史专家，2002 年 11 月。作者反驳了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的说法——邓小平复出遭到了江青等的反对。

) 笔者认为，在毛泽东已经拍板的情况下，江青等是不会反对的。

《难》第 184 页，作者根据江青在批周会议上的表现，断言：“毛的态度和‘四人帮’上纲上线打倒周恩来，是不同的。”姑且不论江青是否真的能和毛分开，此处用“四人帮”是不适宜的（因为王洪文并没有批周恩来）。

毛远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多次宣称：“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批林批孔斗争，一个是解决九次路线回潮问题，一个是解决十次路线没有解决完的问题，能不能归结到十一次路线斗争，可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还很难说。”（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第 497 页）因此，江青说十一次路线斗争是毛的意思，而且其他政治局成员也这样认为，叶剑英和李先念就通过汪东兴询问毛。Teiwes 先生采访后得知，毛在批周之前就讲周要夺权，批周之后又问谁想当皇帝？（Teiwes Frederick,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 Armonk, New York, p138) 因此，12 月份的批周会议上，江就是毛的代言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第二、是否存在两军对垒

此书的一大主线就是第 3 页所论述的“与前一段时期抵制‘文革’活动总体上是潜在地、被动地相比，抵制、纠正‘文革’路线和坚持维护‘文革’路线的斗争形成了两军对垒。”

笔者认为，此说本质上就是官方所做的结论：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笔者看来，此说夸大了所谓两军的区别与差异，人为地抹杀了两军之间的互动与相互支持。笔者认为，不能用“非黑即白”的简单思维来论述历史。所谓的两军并没有明显界限，他们只是在毛的指挥棒下去演各自的角色而已，在某个时期造成个别人的批判与被批判。

作者首先从周恩来在各个领域恢复政策的努力开始，就意图贯穿周恩来与江青和张春桥等的斗争。（《难》第 38 页）

（1）四省革委会主任被撤职

作者企图用九大之后，山东等四个最早夺权的省的革委会主任被撤职一事，来证明周恩来纠左的努力。然而作者丝毫没有提及毛的作用。我们要问，周恩来真的有这么大的权力吗？事实是，因为九大之后这几个省仍未稳定下来，不能体现九大“团结胜利”的精神，而毛认为，“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应该较快地告一段落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555 页）在此背景下，才有上述撤职一事。

《难》第 39 页强调，刘格平是“1967 年被江青看中召见，回省后组织造反派夺取山西党政大权。”事实却是：文革开始的时候，因为地域的关系，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卫恒被毛看作是刘少奇、安子文线上的人。1966 年初，中央为了了解情况，将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叫到北京。1966 年 11 月 23 日，刘格平给毛泽东、林彪、康生写信反映薄一波、安子文等人发表声明出狱，而他本人则如何坚持斗争和北平军人反省院的情况。12 月，周恩来、康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刘格平谈话。周恩来对刘格平说，毛主席要你站出来，山西省委瘫痪了，你回去找省委的一些同志组织一个小组，把工作管起来，注意要抓紧经济

工作，特别是山西的煤炭很重要。当刘格平表示不好办时，周恩来说，不要紧，中央支持你。（刘格平《对山西省委审查结论的书面意见》，1983年3月15日；转引自余汝信、曾鸣《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一·一·二夺权概述》，华夏文摘增刊第514期·文革博物馆通讯第348期，2006年7月24日出版）

用江青支持刘格平，来衬托周恩来与江青斗争的“光辉业绩”固然不失为一个办法，但是作者既拿不出来江青支持刘格平的具体证据。又无视毛泽东对刘格平的倚重，如此史书，能称得上信史吗？

（2）老干部问题

《难》第42页说，在“周恩来的督促下，中央组织部提出了一个300多名的高级干部的名单，周恩来、叶剑英排除江青、张春桥的百般阻挠……”作者并未提出具体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

解放老干部的政策，是毛泽东一手控制的，特别是高层干部。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高层干部如何安排都做了具体的批示。并没有发现江青等阻拦的情事。至于在解放一些干部中，江青等针对于个别人的个别问题提出质疑，也是合乎程序的。说江青“百般阻挠”是夸大之词。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有足够材料证明，在贺龙平反一事上，周恩来是起了阻挠作用的。1974年9月初，毛泽东又向陪外宾来武汉的邓小平提出：“贺龙要恢复名誉”。并且强调不要再核对材料了。邓小平回京后，立刻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见《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4年9月4日，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王福生《毛泽东与贺龙》，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76-377页；《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632页）而当时主管贺龙“专案”，且负责核对材料的，正是周恩来。

在毛的一再催促下，李仲公的揭发信在9月23日被鉴定完毕，六天后——1974年9月29日，由周恩来亲笔修改的《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发出。此通知与1982年10月16日的《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相比，平反不彻底。根据《贺龙传》以及《贺龙年谱》的记载，贺龙的主要问题是牵涉

到 1927 年、1929 年、1933 年、1934 年的叛变、通敌问题。而 1974 年的《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对 1927 年、1929 年的事情只字不提，这正是当时《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所提当时立案是“必要的”的依据。而这些事情又同李仲公的信直接相关。李信正是揭发贺龙 1927 年和 1929 年通敌叛变的亲笔信！（安熠辉《“文化大革命”中的贺龙》，载《文史精华》2003 年第 8 期；蒋健《李仲公为什么诬陷贺龙》，载《文史精华》2003 年第 11 期）根据蒋健先生的分析：李是蓄谋已久，但信显然不是 1968 年 3 月伪造的，否则他造假的技术和速度未免也太高太快了，周总理也太好骗了。（蒋健《李仲公为什么诬陷贺龙》）

事情非常清楚，李仲公的信为什么早不鉴定？为什么毛强调不要再核对材料了？这不正说明，阻挠给贺龙平反的是周恩来吗？

（3）四届人大的问题

（I）四届人大的推迟到底是什么原因

从 1973 年 8 月 24 日，周恩来在十大上提出毛泽东要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后，准备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开始。《周恩来年谱》记载，周分别于 9 月 10 日、9 月 12 日、9 月 14 日、10 月 16—19 日参与准备四届人大会议。但是直到 1974 年的 10 月 6 日，周才再次参与四届人大准备活动。根据《难》的解释，这是因为 1973 年 11 月份的帮周会议导致了四届人大的夭折（394 页）。

笔者不认同这种说法。根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在 1973 年 10 月 16—19 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会议筹备工作，并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在这种情况下，“帮周”会议是在 11 月 17 日才开始的，此前近一月的时间周恩来无任何准备参与四届人大活动又怎么解释？事实上，是 10 月 21 日公安部长李震的突然死亡导致的紧急状况，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才被推迟。（Teiwes Frederick,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2007, Armonk, New York, p187；孙中范《不寻常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百年潮》2008 年第 6 期）

作者把“帮周”会议说成是造成四届人大会议推迟的原因，只是想再次证

明“两条路线斗争”泾渭分明，两军对垒无时不在。

(II)关于周恩来在准备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难》书的作者在这部分的材料取舍上是非常不公正的，并且进行了篡改。第395页，作者写道：“1974年12月，在各类代表分配方案产生后，周恩来又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提议增加老干部和青年干部，外事和体育的名额。”然而，根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在12月14日，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会议各类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后，致信王洪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提议在现有名单基础上再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的名额，并提交政治局审议批准（《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685页）。

二者对比，《难》所述多出了“青年干部”一项。笔者认为，这种篡改实际上是把周在11月份给毛信中提及的“中青干部”（这些中青年干部实则造反派代表为主）移到此处，同提议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的名额一起，将中青干部的这种造反色彩抹掉，可谓用心良苦。

实际情况如何呢？

周在安排老干部方面并不见得比安排中、青年人（以造反派代表为主的新人）更热心。周在11月份给毛写信，表示关键在于中青干部的提拔，并且支持他们在政府中任职。此信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有全文。《难》书在404页引用此信的内容时注明资料来源为《周恩来年谱》（1974年11月6日）。但是两相对比，则非常清楚地显示作者实际上是引用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例如年谱中提及“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里面并无“呈主席选择批准，关键在于中青干部。”而这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是有的。

以王海容为例，1970年夏天，由周恩来直接提名，委任王海容担任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1971年7月，王海容被正式任命为礼宾司的副司长。1972年，王海容被提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再过一年多一点，王海容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除此之外，周还提议同毛关系密切的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周还特意提拔了一些同毛没有私人关系的中、青年人，像祝家耀、于会泳等。周催促张春桥和王洪文推荐祝家耀为公安部副部长。周恩来还推荐于会泳出任文化部部长。（Teiwes Frederick,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2007, Armonk, New York

， p219)

然而作者对这些统统不提，把祝家耀等人的事情统统放到“江青集团”的头上，这是客观公正吗？

作者还指责王洪文等借四届人大安排自己的人马，殊不知，周恩来还为此批评上海方面送来的人还不够！（Teiwes Frederick,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2007, Armonk, New York, p223; Elizabeth J. Perry and Li Xun,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p169–171）

作者还在 397 页如此评述：“在此之前，国务院副总理中是没有第一副总理头衔的。这是在医院养病的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并得到毛同意后才设立的，暗示着邓成为周恩来接班人地位。”

事实远非如此。周是第一个提出要设立第一副总理头衔的人，但是周并没有提出候选人。江青则说：“总理比较危险，可能动手术了，他（指邓小平）就跑到我身边说，不得了了，怎么样危险，最重要的问题要有一个第一副总理呀。我说，那还不是你嘛。你们看我蠢不蠢哪。”（《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3月2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实际上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并未遇到什么阻力。

作者还引用《周恩来年谱》上记载的江青在 10 月 6 日向周恩来提出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周恩来未表态一事，来说明“召开四届人大是他们攫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好时机。”且不论当时的中国国家的最高权力在毛泽东手里，在中央政治局，如果说这个名单确实能证明江青要“攫取国家最高权力”，为什么不拿出来曝光呢？

(III)总参谋长

作者在第 398 页论述：“周派和江派谁能控制总参谋长，谁就占上风。因此文官体系的江青集团特别要拼命争夺。”那么作者眼中的周派和江派分别提出的总参谋长人选是谁呢？

《难》说江青推荐的是刚解放出来才两个多月的杨成武。而对于周派提出的

是谁则毫不提及。作者认为江青之所以提杨成武是因为（1）只要邓小平当不上，其他人可以；（2）杨成武的权威小，易于控制，再一个就是进行平抚拉拢。

周派的代表邓小平对总参谋长人选也有提名，提的是陈锡联。而周恩来并没有提出任何人选。（Teiwes Frederick,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 p204; Teiwes Frederick 作者在2005年1月的采访，被采访者看过提名陈锡联和杨成武的档案文件。）

如果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作者对于江青为什么推荐杨成武的说法还站得住脚么？

邓小平提名陈锡联，一点都不忌讳毛一再强调的山头问题，只能说明这是投毛之所好。自陈锡联出任北京军区司令一职后，仕途一帆风顺，在1976年达到顶峰。而江青提名杨成武也是出于同样原因。这在周恩来1974年11月给毛的信中说得非常明白：我极端（旁注：积极，误写为极端，已电话请东兴同志告王、唐两同志改正。周后注9/11）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便于杨成武同志学习工作，成熟了，小平可不兼，好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版第534页）毛选邓则化解了江和邓提名上的矛盾，更重要的是符合毛此时的平衡原则。

杨成武被毛看中，对比同一时期的罗瑞卿则可看出明显的不同。邓小平对于整肃罗瑞卿表示出一定的保守意见，而杨成武在整肃罗瑞卿时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余汝信《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系》，华夏文摘增刊第471期·文革博物馆通讯第305期，2005年12月19日出版）杨成武在一定程度上是牵制邓小平的一个棋子，也体现出毛对邓的信任度并不是百分之百的。而陈锡联则在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副总理，预示着进一步的高升。

(IV) 风庆轮事件

《难》在399—405页集中论述了风庆轮事件。作者引用王洪文在1980年被审讯时的供词来证明此事件是意图阻拦邓小平任参谋长一事和“‘四人帮’一开始就打算把矛头指向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风庆轮只是个引子。”

作者引用了大量资料试图说明“四人帮”是蓄谋已久，特别是江青在 10 月 17 日逼邓小平表态一事。但是作者只提供了江青等人的背景资料，却没有提供邓小平的背景资料。10 月 17 日发生的事情是蓄谋已久的么？

首先，笔者在《周恩来年谱》或者其他资料看到邓小平在整个批林批孔中并没有对周恩来表示出同情或者是站在周恩来这边。相反，邓小平却有明确支持批林批孔的记录。早在 2 月份，周恩来就建议“现在确实有些单位、有些省的个别领导者和个别老干部在‘回潮’，在谈‘复旧’，政治局同志请小平同志在适当场合批判这些错误，会较别人有力，当然要为他提供典型可靠的材料。”（高文谦

《晚年周恩来》第 500 页）在 1974 年 3 月 8 日，军委六人小组针对在军队中如何批林批孔召开会议。会议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在会上猛烈批了时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政委的陶鲁笏。邓小平批陶鲁笏要脱下裤子，要执行江青的指示，从文革中好好学习，积极进一步推动批林批孔运动。（Teiwes Frederick,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 p181；作者资料来源为 ANU 大学会议原始记录摘要）再加上邓小平在 1973 年年底批周会议上的表现，江青认为邓小平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这是非常自然的。

其次，10 月 17 日的政治局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针对风庆轮问题，作为已经被毛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还没有表态。江青询问邓小平的态度也是自然的，谈不上什么蓄谋已久。

最后，风庆轮事件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而非邓小平。而此时的周恩来尚没有获得主持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的权力，如果单是指向周恩来，又如何能够影响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呢？况且人事的安排最后还是由毛一手决定。

事情的发展则是毛泽东对于风庆轮认为是小事，不值得大惊小怪。风庆轮所能够带来的仅是江青偶然和邓小平的冲突从而让毛认为江青等人并不能够理解自己的战略安排——要和邓搞好关系，为此王洪文在毛看来是不能够承担大任。这是江青始料不及的。反过来，后来邓小平去找了江青。对此，毛表示支持邓。（Teiwes Frederick,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 p216)

而且根据事实上发生的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情况，把风庆轮看成是江青等把“矛头指向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也是毫无根据的。

(V)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

《难》在 406 页继续了一贯的腔调：周恩来和邓小平、李先念多次研究，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而文化部、体委则可做些妥协，便对江青一伙让步，同意了于会泳任文化部长。以至作者最后还提出“如果在毛泽东当时严厉批评‘四人帮’利用四届人大组阁阴谋之时，周恩来能利用这一时机和他的重要地位，对“四人帮”采取强硬态度和果断措施，而不仅仅是限制他们的权力，‘文革’岂不是破产更快，党和国家不是少受损失吗？”（第 408 页）。

风庆轮事件之后，周恩来劝说邓小平找江青谈，要搞好关系。根据后来江青的叙述，虽然有分歧，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Teiwes Frederick,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2007, Armonk, New York, p181；《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1976 年 3 月 2 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根据毛泽东的安排，“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权利提出候选人名单，难道江青等人的提名就是夺权？

根据《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主持 1974 年 12 月 21 日政治局会议，草拟出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第一、第二方案，并送叶剑英、邓小平及江青、张春桥等阅。

张春桥在 11 月 20 日就被毛任命为第二副总理（仅次于邓之后）。而主管文化和教育恰恰是张春桥的分工。尽管江青在 1 个月以前写信给毛表达自己的意见，提议迟群为教育部长。但是在 12 月 21 日，江青等人并没有针对教育部长一职提出任何候选人。相反，在 12 月毛、周会见的时候，周是带着未定意见向毛泽东提出是迟群还是周荣鑫为教育部长。毛泽东否定了迟群。（Teiwes Frederick,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 p227—228, 作者采访国内党史专家, 2005年1月; 傅颐《教育部长周荣鑫的最后岁月》, 《百年潮》2002年第2期)

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文化部不比教育部更重要。根据《周恩来年谱》, 1970年3月10日, 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设立国务院文化组问题, 周恩来提议吴德为组长, 刘贤权为副组长, 石少华等七人为组员。当四届人大来临, 周恩来征求江青、张春桥关于文化部部长人选意见的时候, 江、张提出的人选是吴德而非于会泳! (朱元石《吴德口述: 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103页) 但是吴德坚决推辞, 此时的于会泳是吴德的副手, 而且自国务院文化组成立以来, 于就在周领导下工作, 为文化组组长之一。虽然吴德推荐刘大杰, 但是在吴德拒绝出任之后, 是周恩来提议于会泳为部长, 而这导致了江的极度不满, 并拒绝向于会泳祝贺。(Teiwes Frederick,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1972-1976》, 2007, Armonk, New York, p229—230)

因此, 所谓的“四人帮”利用四届人大组阁阴谋之说根本是站不住脚的, 更谈不上周恩来可以利用时机和地位“对‘四人帮’采取强硬态度和果断措施”了。

因此笔者认为: 文革中根本不存在周、江两个阵营的对垒。笔者有足够的证据能表明, 周、江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相当一致, 都是在毛的旨意下行事, 所不同点在于采取何种形式予以完成。周、江在所有重大的根本问题上没有重大冲突, 相反, 双方的配合相当良好。周恩来不仅在工作上, 就是私生活上对江青也是特别照顾的。

除上所述, 笔者对于《难》中叙述的(1)批左和批右的冲突; (2)邓小平的复出和周恩来的关系; (3)批林批孔运动等问题都有不同看法。限于篇幅, 暂且打住。

【抢枪专题·史林一叶】

按：在文革的“全面内战”中，许多地方发生过的抢枪——从军人手中或军械库、军火运输列车中抢夺武器的事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史无前例的现象。鉴于文革学界对它的了解和研究还很不够，本刊特设这一专题，以供学者参考。本刊今后还将编发一些不同的专题。希望读者为此献力献策。

江西红卫兵抢枪和毛主席批示

王广宇

1967年夏天，江西的一个造反派组织抢了江西省军区军械库的枪支弹药。周恩来总理得知后，上午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抢枪的造反派必须交出抢去的枪支弹药，并批评了抢枪的造反派是严重的错误。下午，毛主席对此事作了批示。

大约是1967年8月初的一天（注：应为6月底，参见本期《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总支委员会通报》和卜伟华《关于文革中的夺枪问题》），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值班室，凌晨接到一个由南昌打来的长途电话。打电话的是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钧同志，他在电话中向中央文革报告一个紧急情况。他说，昨天夜里南昌一个红卫兵造反组织，砸坏了江西省军区的军械库，冲进武器库抢走了一、二百支步枪和一部分子弹，守卫仓库的战士无法抵抗，眼看着把枪抢走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军队里一部分支持这个造反派的战士，配合抢枪的造反派，把仓库打开的。皮定钧说，我们正在同抢枪的一派头头谈判，说服他们把枪交回来。

办事组当夜值班的矫玉山作了电话记录。第二天早晨，我看到这个电话记录，觉得情况紧急，就交给了办事组《要事汇报》的编辑何天齐，嘱咐他马上编发《要事汇报》，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起床后送给他们。

与此同时，周总理值班室也收到了内容相同的报告。周总理得知后，决定

马上在京西宾馆开会研究江西红卫兵抢枪问题。这是当时我们所知道的第一起红卫兵公然抢夺军区军械库枪支事件。周总理值班室通知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参加。大约八、九点钟，我随同张春桥一起去京西宾馆参加研究抢枪问题的会。办事组管会议的周占凯（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会务组成员）通知了中办和新华社作录音和速记记录，周占凯是否也参加这个会我记不太清楚了。

研究江西红卫兵抢枪问题的会是在京西宾馆的一个大客厅召开的。周总理亲自主持会议，参加者约二十人左右，其中有总参的杨成武及工作人员，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等，江西省军区的负责人，名字我都忘了，再就是总理的联络员和秘书赵茂峰等；几个新华社记者、中央文革的记者也参加了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除张春桥参加外，我印象中，中央文革顾问康生也参加了。

周总理要江西省军区和驻江西记者先汇报江西红卫兵造反派冲进军械库抢枪的过程。在汇报过程中，周总理、张春桥、康生不时提问和插话。听完汇报，周总理明确表示，人民解放军的枪支是绝不能抢的，公然抢枪是无政府主义的表现，是很错误的。同时总理严肃地批评江西省军区没有处理好与不同派别红卫兵的关系，支持一派，压制一派，这也是导致抢枪事件发生的原因。造反派抢枪固然是错误的，但军区对重要军事设施疏于防范，红卫兵轻易地冲进军区军械库，责任也在军区。这些造反派怎么能冲进军区军械库呢？他们怎么会知道枪支放在什么地方呢？在会上似乎有人说，军区内部也分成两派，是支持抢枪的军队造反组织提供了信息和方便。会上，好像没有人提起军区发枪给保守派的事情。

周总理坚定地说：不管红卫兵有千条万条理由，抢枪是绝不能允许的。必须责成抢枪的造反派马上把抢去的枪支如数交还军区，并叫造反派认识抢枪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是错误的，违背毛主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教导。周总理说，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家名义给江西红卫兵发一封电报，限令他们在接到电报后，立即如数地把抢去的枪支交还军区。此外，军区也要承担责任，做好抢枪造反派的思想工作，并同他们的头头谈判，红卫兵合理的要求要给以满足，有错误的军队干部该检查也要作检查。

对周总理上述观点和讲话，开会的人士都一致同意，包括康生、张春桥也支持总理的决定，没有对让抢枪的红卫兵交回枪支提出异议。

周总理责成与会的联络员和部分记者当场起草一份电报稿。起草好以后，在会上讨论一次，赶快发到抢枪红卫兵手里，并向南昌社会和各派红卫兵公开电报。

会开到近中午时分，总参和京西宾馆负责同志提议是否先吃午饭，周总理表示同意后，对杨成武说：中午饭要简单，吃便餐，不要搞成宴会，四菜一汤就可以了。周总理又补充说，以后开会都不要铺张浪费，就按工作餐的标准四菜一汤，我们开会的都是自己的干部和同志，不要搞得那么复杂。

果然，这天中午饭就是四菜一汤，周总理和与会人员一起吃饭。八个人一桌，四菜一汤有荤有素，但菜量还是足够吃饭的。我同总理秘书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桌，首长们另外一桌。

下午，我随张春桥一起回钓鱼台。后来电报发没发、发出后情况如何，我就不了解了。

就在当天下午，戚本禹到办事组值班室一看见我就问：“上午京西宾馆的会你去了？”我说：“我随春桥同志去了。”戚说：“你怎么不汇报？会是怎么开的？”我说：“就是给江西抢枪的造反派发电报，动员他们把抢去的枪交回来。”戚说：“干嘛那么急，匆匆忙忙地发电报！”我解释说：“春桥同志会向小组汇报上午开会的情况。会上有录音，你要了解，我叫小周把录音带找给你。”我请周占凯把京西宾馆开会的录音带找出来给戚本禹。后来，好像戚本禹没再要，也可能忘了。

戚本禹敢对周总理主持的处理江西造反派抢枪事件的会加以“匆匆忙忙发电报”的指责，是有来头的。就在这天下午，毛主席批了办事组编的《要事汇报》。原来，我把皮定钧打来的电话记录交给何天齐编《要事汇报》的同时，何天齐又收到一份记者站（或长途电话组）的报告，这份报告是抢枪一派的红卫兵反映江西抢枪事件事出有因。他们说江西省军区支持保守派，打击压制造反派，说江西省军区发给保守派上百支枪和一些弹药，用来对付造反派，造反派被迫才去军区军械库抢了枪和子弹等等。

《要事汇报》把这两个来自不同渠道的报告精炼成一、二百字，同时刊登出来。由于事关重要，上送毛主席，同时发给林彪、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

毛主席看了这期《要事汇报》后，就在《要事汇报》上写了批语，原文记不清了，大致内容是：江西省军区大发枪支给保守派，造反派没有枪，为了自卫才被迫抢了军械库的枪。江西省军区压制造反派，支持保守派，给保守派发枪。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给造反派发枪呢？

这个批语是文革小组开会前保密室交给何天齐，我在何天齐处看到的。当晚，小组会（碰头会）上传阅了毛主席的批语。

《电报》到底发没发，看到毛主席批示后，又作了什么新决定，我就不知道了。

1967年8月底，我被召回马列主义研究院接受造反派的审查。此时，我已失去人身自由，不能离开研究院。大约1967年10月份以后，我在研究院听到一个消息说，北京卫戍区已经给北京高校的著名造反派发了枪支（注：实际上只发了枪，没发子弹）。据说，清华大学《井冈山》的蒯司令，北航《红旗》头头韩爱晶等都配带上了手枪（注：并未专门给他们配发手枪）。此事不知是否确实。

【抢枪专题·故纸堆】

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总支委员会

通 报

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新华社江西分社和记者站南昌记者组的记者以及通讯员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及时地向中央提供了南昌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六月二十九日晨，记者刘光辉、赵永安、李醒民、詹文良、孙璞方（总社注：《红旗》驻江西记者，下同）等同志，有的不顾个人安危，深入武斗现场采访，有的废寝忘食，认真研究，整理材料，及时、准确地报道了南昌军分区大发枪弹给保守派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由于他们想革命派之所想，急革命派之所急，做革命派之所需，同革命派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报道对中央了解和处理江西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材料。

根据戚本禹同志的建议，总支委员会研究，决定给予刘光辉、赵永安、李醒民、詹文良、孙璞方等五名同志通报表扬，以资鼓励。

希望刘光辉等五同志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党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要虚心地向他们学习。

学习他们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坚定不移地维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学习他们“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艰苦奋斗，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把革命派的需要当成无声的命令，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勇敢地站在阶级斗争的最前线。

学习他们的对人民革命事业认真负责的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总支委员会希望全体同志通过这一学习，更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破私立公，搞好思想革命化，人人争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红色勤务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人民立新功。

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总支委员会

一九六七·七·十八

原载首都新闻批判联络站主编《新闻战报》第十一期，1967年8月12日出版。该报这期头版头条是戚本禹7月14日给王广宇、王道明、徐学增、杨松友并记者站同志的信，建议通报表扬刘光辉等五记者。头版还配发了新华社《新华公社》赴赣通讯员采写的相关通讯《战地黄花》。

【抢枪专题·文摘】

紧急！红卫兵涌向军火库

刘祖万

1968年夏初，我是解放军某部班长。那时我刚从重庆某厂军管会回到部队。一位高个子、清瘦面庞的副部队长乘车来到连队，要调我们连去川东某城市附近一座山上守卫军火库。副部队长给连队干部传达了命令后，并亲自给连队作了动员报告。按常规，一个连在本部队范围内调动，是不需要一位副部队长做动员的，但这次例外，因为全川各派武斗激烈，到处都在告急，如果将一个部队的军械弹药流失到社会上，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副部队长当时正在川东某县“支左”办公室兼主任，他对全国、全川的斗争形势比较清楚。他给全连干部、战士例行地讲了一番“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后，呷了口开水，并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同时扫视了全连干部战士一眼，深沉地说：“同志们，你们这次去保卫弹药库的担子可不轻啊！我三八年参军，大小战斗经过一百多次，打死的敌人我也记不清。可是那些敌人是明摆着的。我可以无愧地说，我没有打错一个好人。而现在，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虽然分成几大派了，他们都是些认识不同、观点不同的同志，我们没那本事分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朋友！”副部队长讲到这里，仿佛察觉到自己的话不大符合毛主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教导，赶紧把话锋转了过来：“毛主席要我们分清敌友，但我们水平低，如今还不大清楚哪一派是革命的，哪一派是不革命的。因此，在没分清的时候，我们不要感情用事，不要下定义，要多观察多想想，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不懂就扣中央的……”副部队长最后重复了几遍：“武器不能丢一件，任何一派都不能弄去一枪一弹，丢一支枪、一发子弹，我们就是犯罪！”

我们全连当夜急行军赶到某山军火库。

这是一个可以武装一个师的军火库，原是师高炮营驻守。1967年初高炮营参加援越抗美后，仅有一个排的后勤兵守卫，兵力十分单薄。我们去的那天拂晓，连长就率领班长以上干部察看地形、环境，设置哨位。当时我们连去的目的，不在于防止特务反革命，主要是防止红卫兵造反派抢武器。因此，连长把原高炮营的哨位均利用起来，并在弹药库左侧的高山上设置了个观察组，昼夜值班。

这座高山地形十分险峻。它像会场中的巨人，耸立在群峰之中。它不但能

俯瞰周围的大小山脉，还能观察到县城至仓库十六公里范围内的情形。天气晴朗时，只要你在巅峰向县城方向眺望，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江像银色玉带向东南方延伸着，那些百舸争流的船只上下奔驰。从县城到仓库，渡过江，就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公路在山间穿行，把县城与仓库联接起来……

连队上山不久，各种小报，正道消息、小道消息，源源不断传上山来。全川武斗形势愈演愈烈，部队司令部每天都要向仓库通报，什么地方的部队武器仓库被抢了，并指示连队要百倍警惕，发现可疑形迹要及时报告，要做到仓库万无一失。连队干部们非常紧张，不但昼夜轮流值班，而且每天的“天天练”（天天早上的军事训练）也暂停，各班排主要是抓紧政治思想教育，学习毛主席1967年视察大江南北的指示，以班为单位天天开会，天天学习，干部战士天天作思想汇报，工作汇报，从思想到行动都进入了临战状态。只听一声号令，就要冲锋陷阵。

记得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连长和指导员把我叫去，连长十分严肃地说：“刚才司令部通知我们，近几天情况异常，某部弹药库已被抢了。首长要求我们仓库万无一失，确保绝对安全。我与指导员决定你率一个观察组去山顶值班，一有问题及时报告！”指导员接着说：“祖万同志，你文化高，又善动脑子，我们来仓库的目的首长讲得够清楚了，我不再重复。你们去后，一定抓住战士的活思想，不要有任何松劲麻痹情绪，对公路上的行人、车辆甚至花草、树木的异样都不能放过，告诉全班同志，保卫好仓库就是保卫文化大革命，就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人民的利益！”

爬上山峰，夜幕已完全笼罩着整个世界。我举着二十倍的望远镜观察县城方向的情况，县城的轮廓已模糊不清，但那犹如银河落地的灯光却历历在目，波光粼粼的江水不时把那些灯光拉长、揉碎……

我观察一阵，把望远镜递给了副班长，心情十分沉重地倒在草坪上，望着天空极少的几颗星星，思绪万千。文化大革命虽然说是“形势越来越好”，可是这武斗从棍棒、钢钎到机枪、大炮，能说好么？我在重庆某厂军管会时，就差点把命送掉……那天，我们军管会学习后，我与几个战友拿起碗去食堂吃中饭，刚走到公路上，一群手持钢钎头戴藤帽的武斗队员，像饿狼一样扑向刚下班的十几位中年女工，女工们手无寸铁，没有任何防备，就被武斗队员打倒在

公路上，有三个女工向旁边的水田埂跑，也被打倒在水田里，我们看见后，把碗向地下一丢就冲过去抢救女工。我们十几个战友一人抱起一个老大姐，有的已经昏死，有的鲜血直淌，在我们的护卫下，武斗队员仍不放手，还要“痛打落水狗”。我一面抱着一位奄奄一息的老大姐，一面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怒斥他们。就在这时，一根钢钎朝老大姐的头部刺来，我敏捷地用身子一挡，钢钎从我的腋下刺过，正好戳进我的棉衣里，有惊无险的是既没伤到老大姐也没伤到我。但如果是开枪呢？……

大约 9 点半，副班长突然把望远镜递给我：“班长，你看！”我翻身跃起，接过望远镜，他说：“从东北方向过来一支车队！”我举起望远镜，随着头车的灯光移动，过了二十多分钟，车队到了县城和上仓库公路的交叉口停住了。随后灯也熄了。我脑子里嗡地一下，浑身紧张起来，一般汽车不会在那一带停车，因为只有两条路可去，一是去江边过轮渡到县城，一是来仓库。怎么会在那里停呢？使人疑惑的不是只有几辆车，而是至少有二十辆左右，肯定是上山来的！我把想法告诉全体同志，大家都赞同我的分析。我忙对副班长说：“你下山报告情况！”我话音一落，副班长就带着一名战士消失在黑暗中。副班长正给连长、指导员汇报情况时，司令部的电传也到了。部队首长发现了同样的情况，指示部队百倍警惕，继续注意观察，不要疏忽。

那晚，我们观察组没有一人睡觉，连队和守仓库的排也没有睡觉。连队领导和仓库主任以及守卫开了半宿会议，遵照部队首长指示，驻山部队统一指挥，分为两线，连队堵塞外围，仓库排护库。外围又分为宣传组和武装阻拦组，宣传组宣传毛主席的视察大江南北指示，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武装阻拦组是在做艰苦细致工作无效，仍有少数人冲仓库时，就实行武装阻拦。负责库内保护的同志，主要锁好各仓库的大门，堵好窗口，将仓库周围的铁丝网修复好，各组同志不得撤离职守。我们连指导员为临时指挥部指导员，连长为临时总指挥。指导员最后强调说：“同志们，常言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就是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了。大家要牢记人民解放军对人民群众永远是宣传队，工作队，决不是镇压人民的工具，在任何情况下也只能我们倒下，不得向人民开枪，要坚决执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纪律，这是考验每个同志是真忠于毛主席还是口头上忠于而实际上不忠于的试金石！”

那天晚上，大家虽然心情紧张，但平静地过去了。

天刚明，指导员将我调下山，要我到宣传组，山上由副班长负责。

我下山还没来得及洗脸，宣传组长、连副指导员就派人来叫我赶快走，说“来了”。我忙把毛巾拧干搭在铁丝上，尾随宣传组奔向垭口，我们还没走拢，就被红卫兵堵了回来。

原来，昨晚那队汽车载着数百名抢军火的红卫兵，他们为隐蔽，将汽车停在远离仓库的公路岔口，先遣队二百多人徒步上山，企图趁部队未起床之机出现在仓库门口。见部队早有准备，他们仗着人多的优势，五六人一组，将我们三十几人的宣传组一个人一个人地分割包围开了。我们宣传毛主席指示，他们笑着说都背熟了，为了自卫，无奈，向亲人解放军借些武器，还说江青同志都指示“文攻武卫”，说总不能等他们来杀我们呀！在把我们宣传组包围起的同时，又有数十辆大卡车载着红卫兵浩浩荡荡朝仓库飞驰。宣传组长、副指导员看出学生们的动机，命令战士向仓库撤退，保卫仓库。可是被围着的战士要冲出去实在不容易。副指导员把声音喊哑了，战士们都没脱开身。

在我们被围困的同时，连队首长也已被红卫兵头目们包围，要他们打开仓库借枪。连长指导员看清了他们的战术，指导员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将连长留下与之周旋，自己冲进部队，组织铜墙铁壁拦阻涌向仓库的红卫兵。上午 10 时，整个仓库已围了四五千红卫兵，连队组织的铜墙铁壁已力不能支，不断把兵力压缩到仓库大门外的坡坎下，指导员和排长们满头大汗在第一线穿来穿去动员，要战士们用生命和鲜血保卫仓库，不丢一枪一弹。大约 10 点过，分割宣传组的几百名红卫兵见自己的伙伴们都往仓库涌，他们怕自己弄不到枪，便放弃了宣传组向仓库跑。

副指导员带我们抄山路绕到后面，梭（注：方言，即“滑”）下绝壁，爬过铁丝网，去到仓库门口。大汗淋漓的指导员见了我们，仿佛得了救似地命令加强大门方面的防堵，副指导员问：“报告上级没有？不增派部队来恐怕……”

指导员说：“上级首长已调增援部队了，但是红卫兵沿途阻拦，恐怕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们要立足现有力量保卫。”副指导员蹙了蹙额头，率我们加入了战斗。

设墙的部队已把半自动步枪的刺刀打开，红卫兵见解放军要动真格的了，

吓得潮水般地倒退了几米。部队打开枪刺的动作，是指挥部临时决定的，只准打开刺刀吓唬，绝对不准刺伤一个红卫兵小将，谁要犯了纪律要军法从事。当红卫兵后退时，我们这些手持红宝书的宣传员们便冲进两米多宽的真空地带，扬起红宝书宣传毛主席指示，近万名红卫兵，在仓库前面潮水似地涌动了一阵，见解放军上刺刀是吓唬他们而没真戳伤一个人，便又向真空地带压来。就在这时，我们二排五班的几个战士累倒了，几个戴“纠察”袖套的大个子红卫兵发现五班露出的薄弱点，一齐涌上来，将我们的人墙撕开了一道口子，把连队大部分干部战士推到大门两边二十米处，少数压在大门上。被压在大门上的指导员和副指导员的脸上不知是汗还是泪，哑着嗓子还在宣传：“小将们，你们不能这样，你们要犯大错误，我们这是战备……仓……库……”指导员的声越喊越小越无力。

背贴仓库大门的干部战士虽已又饥又累，但没有一个人再后退一步，因为再无法后退了。

大约 11 点，指导员脸色苍白，大汗如注。副指导员对我说：“快，快把指导员扶下去。”我知道指导员是个十二指肠溃疡老病号，我去扶，指导员按着胃部的手将我一推：“莫管我，快堵住，快……”就在这时，红卫兵从被挤在大门上和墙下的战士们的身上向大门上方和窗口上涌，大门上的锁已被扭掉，窗口上的钢条已被拉掉，红卫兵已向里涌去。就在这时，在仓库内守卫的三班班长叫了起来：“老子宁可坐牢打死你们两个也不要你们把武器拿去杀人民……”随着喊声，哒哒的冲锋枪子弹射出窗外，一个红卫兵吓得从窗口上滚了下来。这时，红卫兵才明白解放军真开枪了！就在那个红卫兵应声滚下来的同时，我们指导员扑向了窗口，将冲锋枪口推向了天空……这一霎时，红卫兵又从指导员的身上踩了过去……

干部战士都呆了，被抢救起来的指导员也呆了。干部战士的脸上都挂起了泪珠，说不清是为没完成任务还是为这些武器散出去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哭。望着被抢的枪支弹药，指导员撕裂心肠地自责：“我们没有完成任务，没有完成任务！”

后来部队首长都来慰问全体护库干部战士，他们去仓库大门口默默地站了很久，说解放战争时要有这一库武器至少能歼灭一个军的敌人，现在落到红卫

兵手里文攻武卫，不知又有多少无辜群众遭殃。首长们说着也流出了泪花。首长们不但没批评我们，还表扬我们连队守卫顽强，完成任务好！仓库护库排也受到了表扬。但开枪的三班被提前处理复员了。

原载《红岩春秋》杂志 1995 年第二期。作者刘祖万文革中在五十四军一三五师服役，写作此文时任中共广安县（今广安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已病故。

【抢枪专题·故纸堆】

周总理指示

四月二十八日（注：1968 年）十六点，周总理指示张、梁、刘、张（注：指当时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主要领导人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位同志马上到学习班（注：指正在北京举办的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找八一五派的头头谈，指出他们抢枪是违犯“九·五”命令的，直接影响战备和援越抗美的任务，是非常错误的。为此：

一、要他们立即停止抢武器的错误行动。

二、抢去的武器通通交回。

三、公开承认错误，否则严办，中央马上向全国通报肇事的为首分子，是盗窃国库的坏分子。

四月二十九日十时三十分，周总理给张国华同志电话，就重庆抢枪、开枪问题作了指示，其精神是：

一、八一五派抢 351 库问题，一定要按照周总理四月二十八日的三点指示执行。

二、长安厂（注：国营长安机器厂，重庆大型国防企业）办公楼起火、三钢“延安兵团”、军工井冈山“长安兵团”开枪打死打伤人的问题（注：1968 年

4月28日，重庆市消防大队奉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于晚9时25分去长安机器厂救火，事先通过反到底工总司与扼守必经路段封锁交通的重钢三厂反到底派武斗据点取得联系，顺利通过，但随后增派的消防车未再事先联系，遭该武斗据点截击，消防干警死9人、轻重伤17人，其中解放军战士2人；被抓走23人，消防车被打坏3辆），要交出肇事的头头、凶手和武器。

三、这两件事必须这样办，要严格按指示办，否则要通报全国。

四、八一五派抢四〇五团的枪要将其武器交回。

总的，重庆不能再乱了，不能把重庆搞瘫痪了，再搞，一定按“九·五命令”、“二·六命令”办事。这是中央的意见，是军委的意见。

原载红卫兵重庆警备区重庆大学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主编《8·15战报》第62期，1968年5月4日出版。

【抢枪专题·蓦然回首】

我所经历的文革抢枪事件

张传俊

部队的枪竟被老百姓抢去，而军人只能执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死不开枪”的命令，现在听来犹如天方夜谭。而因为某些因素，目前的史志和文献提到这样的事也只是轻描淡写了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是当事人也逐渐忘却了。但历史是不应被篡改被忽视的。

1967年5月，我所在的空军高射炮某部从援越战场上轮换回国后，在广西明阳糖厂换装休整了一个星期，便通过铁路行军到达了广州市，开始担负城市防空任务。

那时候，广州各派群众组织间的斗争已经很激烈了，大字报满街都是，小字报也满天飞。由于部队出国时文革还没有开始，看到这些情景只是当新鲜。

再说了，我们部队被命令不介入运动。当时我连驻守在郊区石榴岗附近一个叫老鼠岗的小山上，天天都能听到附近海军卫校与后勤这两个允许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军队单位，喇叭对着喇叭用语录辩论，有时还相互间开枪。

城里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郊区农村还是平静的。农民啥时候也要种田种菜，季节是不等人的。连队与所在的土华大队军民关系搞得也比较好，经常互相走访。连队还派了几个战士去村小学帮着搞宣传。真正发生冲突是在1968年8月之后。

枪被农民抢了

当时，中央制止武斗的“七三”、“七二四”布告是用空军的安一2飞机直接向群众散发的，本想这下可以制止武斗了。谁知道布告更扩大了武斗的规模，因为群众知道广西、陕西都真枪实弹打得那样厉害了：“抢劫援越物资”、“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于是，各派组织也不甘“落后”，开始冲击部队，从“要枪”发展成了“抢枪”。

农村的群众组织“贫革联”在城乡结合部安上了路障，防备其他派别组织的“入侵”。开始是几个工厂到连队“借枪”。他们一闹，附近的几个村子也发话了，他们也要“借”。于是，有的连队发生了抢枪事件，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团里没有办法对付，不得不指示连队把枪埋起来。当兵的要埋枪？怎么个埋法？一时间连队干部也都没了主意，只好匆忙下令让各班各自想法先埋了。

记得刚刚过完了“八一建军节”，我们连开始埋枪。可是，班长们想不通，战士也有抵触情绪，各班只好草率应付，结果酿成了大错。

我们连营区所在的小山两面环水，视野很远。连里布置在营房处设一个岗哨，负责观察大路方向，在阵地处再设一个岗哨，负责监视后山坡。一旦发现情况就以长音吹哨子。

那天连队还在吃早饭，岗哨突然发现大路上涌来了黑压压的人群，立即吹哨子报警。战士们纷纷扔下饭碗，跑回宿舍穿上军衣，列队集合。这时，老百

姓已经涌进了营区，这是来自附近土华、小州、新窖三个村的群众，村干部我们都认识。他们先是与连干部“商谈”，需要借枪，说其他派都有了枪支武装，他们没有枪要吃亏了。他们还说，你们是防空的，大炮我们不动，只是要枪，连干部当然是严词拒绝。在吵嚷声中，只听得领头的一声口哨，老百姓们冲进了营区，开始在宿舍里找，敲击木板房的墙壁。战士们除了拿着语录本喊口号，毫无办法。这时阵地上传来哨音，又一股群众从后山冲上了阵地。按预先分工，每个班除留一人看守宿舍外，大部分战士都立即上了阵地。此时山上山下全是老百姓，赤着脚，光着背，有一千余人。连里的七十来号人瞬间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炮班的枪草草埋在炮位旁的山坡，混乱中已经无影无踪了；炮弹箱逐一都被打开，望着油亮金黄的大炮弹，老百姓不断发出“哇——哇——哇！”的惊叹；还有群众好奇地把炮衣掀开看看，总算信守“诺言”，不动大炮。

连指挥所也涌进去了十几人。他们看着无线电台在“么——两——三——四”地发暗语报告情况，一脸茫然。有人试图去动几个箱子，战士只好打开让他们看看。无线班的一个铜皮箱（抗美援朝的战利品）锁着，喊班长来晚了一步，被个老农一斧头就把锁砍了下来，几个农民扑上去一阵乱翻。这下几个战士急了，把那个老农死死地按在地上。老农光着个背，滑溜溜地挣扎着哇哇大喊。最后，他们凭着人多势众，推开我们溜了。斧头被我们一个战士藏了起来，成了以后的“证据”。

两个班的5支枪藏在鸡窝下边，被看出了破绽，经一番争夺给抢走了。炮工班将两箱子子弹用块席子一裹埋在芭蕉树下，也给拖了出来。一箱子子弹两铁盒足有30公斤，那个小伙子一手提一箱，竟光着脚在乱石岗上飞奔而去。看到终于抢到了枪和子弹，老百姓们情绪大振，开始漫山遍野地到处用手挖、用铁棍扎。

我们战士一部分留在阵地上，一部分看守营房，其他的只好一边跟着老百姓到处跑，一边拿着语录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念“七三”、“七二四”布告。可是，这些都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许多战士早饭没吃上，中午也没有饭吃，高温下军衣上下全都湿透，有的战士中暑倒下，被抬回了宿舍。

一阵紧急哨音响起，仪器排要求紧急援助。原来，仪器排利用测高机的大

铁箱将全排的枪埋在小便所里，也就埋了一米深。老百姓用铁探头凿到了铁板，想进行挖掘。战士们全都围了上来，与老百姓对峙着，冲进来的群众被推了出去。厕所的墙倒了，三个尿缸也破碎了。人声鼎沸，臭气熏天，为了保住这箱枪，战士们手挽手组成了三层人墙。面对着这手无寸铁的绿色“长城”，老百姓开始畏缩了，虽然他们手中拿着长矛、铁棍、锄头等。只见几个头头密商了一下，立即组织农民也围了个圈，有好几层。几个群众抓住一个战士，连拖带扛丢出他们的包围圈。出去的战士根本无法再进来。混乱中，有几个小青年拿砖头砸了连长的头，还砸伤了好几个战士。看到此情此景，连长愤怒了，喊文书去拿他的手枪要拼！后来因为这句话，连长还背了个违背“死不开枪”命令的错误，由于大部分战士证实“没听到”，才不了了之。几经反复折腾，被包围的战士人数越来越少，最后老百姓得逞了，撬开铁箱把枪全抢跑了。

中暑的、被砸伤头部的，战士们一下躺下了二十几人。团卫生队的救护车根本无法到达郊区连队，连里只好派人去隔河的海军医院求援。海军医院来了两台车，将伤员运走了。

已经快到晚上十点了。大家将就着吃了点“晚”饭。有几个战士没有吃饭，躺在床上。连干部看到他们脸色不对，急忙命令用床板抬着送海军医院。两个人抬不动，四个人不好走，费尽力气，总算将他们弄到了医院。这时，海军医院两个大房间里全躺着我连的战友。

重新藏枪

第二天，团里来了一台运煤的解放一30。李副参谋长随车来了，从此在我们连里住下，指挥我们一起“防冲击”。在车的副油箱里还藏了50支手枪，让连队隐藏。

李副参谋长马上召开连干部会，经查共丢失20支步枪，这可是军法不容的大事情！他还批评连里各行其事，没个章法，敷衍了事，酿成了这样个大事故。他下令必须与村里交涉，把枪要回来。

副参谋长与指导员一起找到了大队支书，从党员的角度进行交谈，终于取得了进展。当时因为打伤了好几个战士，大队干部们也担心后怕。到了晚上，三个村的支书都来了。他们听说二十几个战士住了院，他们真害怕了！指导员

拿出了国家领导人接见我们出国部队代表的“六二〇会议”长幅照片让他们看，还叫来了参加会议的代表炮排长，声明这是中央命令我们来驻守广州的。同时，炊事班弄了几个菜，李副参谋长陪他们喝了点酒，缓和了气氛。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三天内把枪送回。同时还决定，在此期间，他们要将枪藏好，不得让其他组织抢去；大队民兵来连队协助值勤；发生别派抢夺枪支，贫下中农坚决不让；部队不再追查打人者；连队的大米蔬菜由大队供给，保证连队吃上饭。其实，只要把枪送回来，我们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这天晚上临走时，连队还给每个队干部送了两个出国节余的公斤装肉罐头。

我们焦急地等到第三天晚上，支书们带着民兵终于把枪给抬来了，但声明两箱子弹不给了。

为了防止再次被抢，连里决定马上埋枪。事不宜迟，哪敢过夜，立即行动。各排找出可靠党员骨干参加埋枪。营区四周派出岗哨监视，以防老百姓窥视。炮排把两门火炮悄悄拉出掩体，挖了一长条深槽，将枪用黄油涂抹后，用塑料布捆紧放入掩埋砸实，再将火炮复位。手枪也由炮排负责掩埋。仪器排还是利用大铁箱藏枪，并趁退潮推入河中心挖泥掩埋。由于河水含有海水的成分，两个月后取枪时发现，枪托烂了，枪身也有不同程度的腐蚀。有几支枪膛黄油没有填满，膛线受腐蚀严重报废了。指挥排想到了电影《地道战》的锅底地道口。但地方太小，回风灶坚固，破后难恢复，就选在风灶烟筒下。在仅容一人侧身的进煤口下，用电话班的折叠锹，一点点地挖了个两米深的竖洞，把枪放进去后用炉灰盖上，余土抛入河中。起枪前连炊事班都不知道下面有枪。

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各派都以武器的多少显示实力，抢枪的风潮越来越大。上级通报，说有的连队炮弹被抢去做炸药，让我们稍稍平静的心又悬了起来：几百发大炮弹怎么藏啊！在以后的日子里，天天有造反组织光临连队要枪。工人文明一点，申明他们被欺负，解放军不能不管，你们是炮兵，枪我们是借用，可以打借条。他们想方设法跟战士攀老乡、套近乎，希望暗指一下枪藏在那里。学生们就难对付了。来的大多是中学生，大吵大闹与你辩论，趁乱到宿舍偷拿腰带，有的还穿跑了解放鞋，抢军帽。这时，六八年参军的潮汕兵已经到了连队，广州话他们听得懂。有时新兵与他们发生冲突，打了起来，老兵还要负责看住新兵，以防发生意外。

麻袋厂工人抢枪

一天中午，附近麻袋厂的 100 多个造反派人员冲进了连队，没有先找连干部“理论”就直接下了手，在宿舍的地上砸了个遍，在山坡上用钢钎到处插探。大多数战士并不知道枪藏在哪里，就手拿语录本、喊着口号围着他们转。几个老工人不断打量着山坡上那座足有一人高、用水泥塑的“天安门”城楼。那是我们全连进行军事操练前在那里宣誓、唱歌的地方。营区还有一座“天安门”，是我们每天进行“早请示晚汇报”仪式的地方。他们怀疑枪可能就藏在这座“天安门”下面。几个工人试着用钢钎往里戳。战士们大喊：不准动，这是不忠于……！工人们就从旁边挖，挖几下再往里戳一戳。碰到了砖，他们断定枪就在里面了，有人一声呼喊，工人们全都围了上来。当时有个女的据说是个工会干部，亲自指挥。战士们一边高喊着“誓死保卫‘天安门’”，一边扑在了城楼上面阻挡。这下工人更确认里面有枪了，与战士混战在一起，拼命地挖。经过几个来回的拖拉战，他们终于将“天安门”推倒了。可是，里面除了土石，什么也没有。工人们不死心，继续往下挖。一些战士干脆“假戏真做”，趴在了土石上。工人们刚刚失去的希望又被点燃了。在推拉中传来营区的“天安门”也被掀翻了，战士们愤怒地指责工人“你们这是不忠行为！”“是反革命派！”老工人自知理亏，不再凑前，坐下来抽烟歇息了。但一些年轻的工人不服输，反被激怒了，也开始变相地动手了。他们在那个女干部的煽动下，专抓战士的腰带和下身，有几个暗拿麻袋机上的钩针划撕了战士的军衣，把脊梁都划破了。战士也火了，两人抓一个就往山下扔，连干部担心违反政策，严厉制止，将战士撤到一旁。工人们一气猛挖，一直挖到了大石头才住手。

天色晚了，他们一无所获，终于爬上汽车走了。可是刚走了几步，汽车的后车胎扁了。在战士们一片哄笑中，工人们只得下车步行。后来有个从汽车连转来的兵自称，是他把轮胎汽给放了。

麻袋厂工人没有抢到枪，却赶到了“枪口”上。不久广州各派实行大联合，另一派掌权的把这事捅到了军管会，那个领头的工会女干部成了“出头鸟”。军管会拿来三张女人照片让我们辨认，看到底哪个是煽动抢枪的女人。战士们都指认了同一个女人。原本只要有三个人指认就可定性了，这下可是板上钉钉了。后来听说要判五年，大家都觉得出了口气！当时麻袋厂也派人偷偷来找

连队干部，诉说此女有个刚满周岁的孩子，进了监狱家人咋过？希望连队改口说不是她。但那次抢枪将全连都折腾苦了，还划伤了几个战士，连干部当然是严词拒绝。

麻袋厂属于劳力密集性企业，是部队所在区的大厂，许多干部家属随军都安置在这个厂。这些家属全都是被安排在第一线干活，三班倒，又脏又累。当然，这也不能说是有什么报复的成分。因为，这类企业本来就是这种性质的行业。再说，家属们从农村出来，没啥特殊技能，能安排也算不错了。

在防冲击的日子里

李副参谋长在连队坐镇，出主意掌握政策，遇到的难题重重。在群众冲击时，他要身先士卒，嗓子喊哑了，还几度晕倒。老百姓知道他的官最大，是“那个头、大肥佬”，都冲他“理论”，向他“开炮”。在现场，他常常是地上一坐，一百八十多斤的块头，那些个瘦小的造反派七八个也弄不动他。但也正因为这样，他宽大的脊梁上不知挨了多少拳头。他始终不卑不亢地笑脸应对。附近的老百姓都认识他，亲切地叫他“肥佬”。他总爱穿绿黄不匀，出国时用绿颜料染的黄衬衣，几天不洗汗气冲人。村里一伙女民兵爱逗他，说你怎么穿女人的花衣服？他一本正经回答，懂个啥！这是专门配发的新式迷彩服，只有我有资格穿，我爱漂亮啊！她们哄笑他，大肥佬！又黑又脏！他讥笑道：别看我人黑，可我的老婆漂亮，你们十个也顶不上。说实在的，副参谋长这位解放前就参军的东北汉子，经历了抗美援朝、东南沿海防空、援越抗美，一直过着打游击的动荡日子，没有多少温馨的家庭生活。但他确实娶了个江南俏夫人，温柔贤惠。一双儿女更是英俊聪慧喜人。听说他后来转业到了司法部门，审查卷宗一丝不苟，令同事们敬佩。粗人干上了细活，真应了他的那句口头禅：我这个人粗中有细。

有一次，一只木船满满装了一船手榴弹停在了营房后的桥边，有木把的，有无把的，还有带槽沟花纹的。村里请求连队帮助卸船。副参谋长严令制止：“这是危险品，危及大桥和营区安全，必须远离 100 米外！”可能是“危及大桥”这句话起了作用，船被划到了下游。部队不帮忙，老百姓也有办法。几十个赤脚的村民挑来了装稻谷的箩筐，像拣山药蛋似的装在筐里挑走了。日后问

及村干部，那船手榴弹呢？回答是都上交了。谁知道他们交到哪里了。

实行革命大联合之初，各派都想取得解放军支持，纷纷派出宣传队到军营来演出节目。那时候文学艺术遭到批判，电影只有“三大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文娱生活枯燥无味，节目也是大同小异。但对部队来说，看人也是新鲜事，所以对来者都欢迎。当然，他们的节目都带有一定的派性宣传，在鼓不鼓掌的问题上特费脑筋。不鼓掌不礼貌，鼓了派性节目的掌，就有了支持的意思。战士们自己判断也反映不一致，怎么办？副参谋长出一个点子，看他的手势办。他鼓掌，大家一起鼓掌；他不鼓掌，大家都不鼓。结果，每场演出都进行得很顺利。节目完了，他还让炊事班给做锅面疙瘩汤招待。当然，有时也出了些岔子。演出队看出了门道，就是这个大肥佬在指挥鼓掌，一起“围攻”簇拥着让他走开。战士不看了还不让。参谋长笑答：“我走了，你们演吧。再有不鼓掌的，你们必须向我认错，否则这面疙瘩汤就不做了。”演出重新开始，战士们也有了些判断力，只要带派性内容的就少鼓或不鼓掌，七零八落的掌声弄得演出挺尴尬。这也难怪，抢枪害苦了我们。这派那派都标榜自己是革命的，打人的被打的都用上了语录，让人烦透了！这叫个什么年月啊！

一次演出，最后一个压轴节目开始了，十几个演员绿衣腰带昂首挺胸、威风凛凛，臂带“红卫兵”袖章，假装是在一辆马车上。赶车的是一个化了妆的白胡子老头，手持长鞭。大家齐唱道：一辆马车在大路上飞奔……赶车的老大爷——哎，车一停顿，扬鞭啪的一响，人故意往后一仰表示前进了，不看下面还真有点像是车在行进呢。这个节目演得很多，大家看出了门道，原来是弄块木板下面有轮子，一拉还挺逼真的。本来，收场戏该来个热烈鼓掌。正演着，突然举起了一面红旗，上面是“主义兵”三个大黄字，像是变魔术一般，袖标一眨眼也成了“主义兵”，唱词成了“车上坐的是主义兵”，还反复高喊着：“地总！红总！主义兵就是好！”这“主义兵”抢枪凶、打人狠、外带摸东西，战士们都特别反感，因此一个鼓掌的也没有。演出队的造反“本性”一下子上来了，竟说战士全是“老保”，拿起架子就想来武的。战士们哄笑着就要退场，不看了还不行？副参谋长摆手不让走，说：“咱可有言在先，不演带派性的节目，大联合了你们还演这个，这不是破坏最高指示吗？来，你这小队长做

个检讨，不追究了，面疙瘩都快凉了。”队员反映也够快的，站齐了行了个歪七扭八的礼，高喊“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退场了，拥着副参谋长，还“肥佬”、“肥佬”地叫着一起去吃晚餐了。

局势缓和些了，但枪还是埋在地下不敢取出来。站岗改成坐岗，每天一对男女民兵荷枪实弹在连队门口的变压器房前站岗，守着这座唯一进出的桥头。副参谋长爱逗他们，一次拍了拍女民兵屁股上挂的两个手榴弹。她们哗啦一个转身拉了枪机：“干什么！”“我看看是不是真的。好样的！警惕性还蛮高的，口头表扬一次吧。”“八项注意第七条，不许调戏妇女！”“嘿！我这是检查检查武器嘛，至于你是妇女是少女？没有调查！”副参谋长半真半假地逗她们：“警惕性蛮高，还有个当兵的样！”听说当兵，这女青年兴奋了：“怎么，你们部队接女兵吗？我做梦都想当兵呢！”副参谋长一本正经地说：“还不如当民兵啊，民兵拿枪，当兵的不拿枪了，当这个干什么嘛！卫生兵倒是不用拿枪”“真的！你们要接女卫生兵，我行吧！”“那要研究决定，等着吧！”可乐坏了这个女青年。

在当时，这当兵成了多少人的追求，“保卫祖国”是口号，“不用下乡”才是真的，就是高官的公子千金都纷纷投向了军营“避难”来了。女青年当真了，回去一宣传，第二天又来了好几个，天天来缠副参谋长要当兵。在“等着”、“看表现”的推诿戏说之中，副参谋长完成“防冲击”任务回团部了。这些女民兵不死心，还来找。这时，战士们已经持枪站岗，不让进了。大家都觉得好笑，招女兵，农村的根本就轮不上号，城里也得是有级别的领导干部子女，不然就得找关系走后门。“这么热爱解放军，当个军属嘛还是可以的。”战士们私下里打趣说。

尾声

武斗结束了，收枪行动开始了！城乡结合部的路口都设了卡，出城的车一律检查，防止枪支向外转移。工作队进驻了大专院校，动员师生交出枪支弹药。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也是挖地三尺。当时还组织部队参观中山路地下“渣滓洞”私立牢房，被毁的沙河饭店，中山大学武斗据点……

事隔 40 年，在人生的记忆中难忘啊！当兵时的埋枪经历想起来荒唐可笑，

百十号国防绿瞬间淹没在满山遍野赤膊光脚的老百姓中，也真是体会到了“人民群众是汪洋大海”的含义。当年的当事人，现在都已是六七十的岁数了，真想相聚畅谈话当年，有意思啊！

看看电子地图，老鼠岗的名字还在，周围环境是今非昔比了，高速路纵横，立交桥好像就在附近，四周新添了不少院校和公司；那一望无边的荔枝龙眼林还有吗？那座闸桥两用的桥还有吗？

有机会非得再去看看那铭刻心间的——老鼠岗。

【抢枪专题·文摘】

关于“文革”中的夺枪问题

卜伟华

1967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向应召来京谈判解决问题的浙江、江西、广西、湖南、河南、辽宁鞍山、鞍钢等地的群众组织发出通知，要求他们保证做到：不上街游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不抓人、不扣人、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不夺枪，不开枪。（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496-497页）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中提出：“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不能为了武斗，发动农民制造凶器，发给枪支弹药。”（《“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500页）由此可知，当时“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事件在全国各地频频发生，而且武斗的规模越来越大，所使用的武器已经从拳脚、棍棒发展到大刀、长矛，甚至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和各种军事装备来进行武斗，武斗中伤亡的人数不断增加。毛泽东在1966年7月所预料的“天下大乱”的局面已经在全国的许多地区成为现实，而且混乱的程度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想。

1967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同阿中友协代表团的谈话时说：“有些事情

，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72 页）

1967 年 6 月到 1968 年 9 月，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为混乱的时期，而在这一时期全国各地普遍发生的抢夺人民解放军枪支弹药的事件，就是这种混乱局面的最显著标志。本文试图利用现有的资料，对“文革”中的夺枪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一、最早的夺枪事件

“文化大革命”中最早的夺枪事件可能发生在 1967 年的新疆石河子流血事件中。据记载：“从 1967 年 1 月 17 日到 1 月 27 日，先后有 7 个‘造反派’冲击了武装部门，有 8 个单位的造反派强行接管了武装部门管辖的通讯总机。1 月 25 日下午，毛纺厂等 8 个单位的造反派约 2000 人，进入汽二团配合该团造反派夺权，汽二团掌权派请求独立团支援。当独立团的 92 名指战员赶到汽二团时，汽二团造反派抢夺枪支，夺去步枪 19 支、冲锋枪 7 支、手榴弹 64 枚、子弹 1307 发。1 月 25 日下午 7 时，造反派增至 4000 余名。1 月 26 日零点，在夺枪与反夺枪中，双方开枪，11 人伤亡(5 死 6 伤)。当日，农八师武装处将一部分部队调进师部，对师机关进行保护。造反派要进入师部，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死 2 人，伤 27 人。在公共汽车站等处，双方进行枪战。这一天双方共打死 24 人，打伤 74 人。”（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2 页。

另据记载，当天共打死 27 人，打伤 78 人，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82 页）关于石河子流血事件的性质，曾有过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人和有关的新华社记者认为这是一起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文化革命动向》第 225 期(1967 年 1 月 31 日)刊登了一篇《新华社记者评述石河子反革命事件》的稿件。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负责人丁盛、裴周玉于 2 月 1 日向中央文革小组写报告称事件是因群众夺枪而发生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

纂委员会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1998年，第282页）新疆军区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认为，事件“是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镇压了歹徒”。（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212页）毛泽东出于边境安全的考虑，在此事上没有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而是支持了军区的意见。（1968年5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人时说：“处理石河子事件，不是我的意见，完全是主席的。王关戚几次想翻石河子的案，我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这样干，石河子问题是主席亲自处理的。”）后来将此事定为“反革命事件”，先后被逮捕的有49人，被株连1000余人，被逼死6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第282-283页）“文革”结束以后，对“一·二六”事件性质的说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78年12月27日，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做出了关于原生产建设兵团几个问题的决议，其中写道：“1967年石河子‘一·二六’事件，经反复调查，已查明与张仲翰、陈实、刘一村、王慎等同志和武光都没有关系，完全是丁盛阴谋篡党夺权，调动兵团值班部队血腥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第332页）1979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布：“对因此事件无辜死难、受诬陷和曾被捕入狱的同志，应公开彻底平反昭雪。”（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编《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66年5月至1991年12月，下册，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页）丁盛、裴周玉等关于群众夺枪而引发事件的说法被称为“诬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第282页）因此，“文革”中最早的夺枪事件是否发生在“一·二六”事件中，现在还不能下最后的结论。

现在可以确定的“文革”中最早的夺枪事件发生在四川成都。据史料记载：1967年1月29日，以“成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为主的4000多人于上

午 11 时，冲进市公安局，砸抄办公室和保管室，抢走文件档案资料及公章、空白介绍信、逮捕证、枪支弹药等。到下午撤出时，还绑架 21 名干警。次日，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协助公安部门，以反革命罪逮捕街道工业分团头头 13 人。

（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成都地方史大事记》1949—1989，成都出版社，1995 年，第 117 页。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306 页）

四川宜宾发生的夺枪事件也比较早。1967 年 2 月 16 日，宜宾造反派冲击驻宜 7830 部队，并抢夺轻机枪 1 挺、冲锋枪 1 支、半自动步枪 4 支、子弹 190 发，打伤解放军战士多人。（《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第 308 页）

二、“四川武斗，天下第一”

在全国来说，四川武斗开始得早，规模也大。除闻名全国的成都一三二厂武斗事件外，还有乐山武斗事件。乐山城區两大派群众组织，比较激进的造反派组织名为“红色造反兵团”，相对保守的群众组织名为“四军五部”。1967 年 5 月 14 日，两派群众组织在原中共乐山地委招待所发生剧烈冲突，双方开始时用砖头瓦块对打，“四军五部”被迫撤至城郊。此后，“红色造反兵团”在城内构筑工事，动用木棒、钢棒、乃至枪支守卫，不准城外群众进城。城外群众用木棒、铁棒乃至土炮攻城，并断绝城内的水、电，相互攻守拼杀达 50 余天，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双方被打死 103 人，被打伤 1500 人。

（《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第 317 页）7 月初，谢富治、王力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到成都，支持“八二六”，压制“红成”，致使四川地区两大派的对立情绪更为严重。7 月下旬以后，造反派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大肆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物资。仅泸县武装部的武器库就被造反派抢劫达 21 次，被抢劫步枪 2481 支，轻机枪 115 挺，重机枪 12 挺，手榴弹 115 枚，各种炮 72 门，子弹 28.4 万多发。以至从成都、重庆、宜宾、泸州、涪陵等地开始，全川武斗不断升级，造成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第 321 页）

四川武斗又属重庆最为厉害。在重庆有许多大型军工厂，有生产常规武器步枪、冲锋枪的，有生产坦克、装甲车的，有生产各种炮的，这些武器在武斗中都派上了用场。1967年7月1日，重庆“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在建设机床厂发生武斗，“反到底”派占领全厂生产区，该厂生产和保存的半自动步枪大量流散。此后，抢枪事件不断发生，重庆武器进一步扩散。（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8月12日，重庆两派群众组织武斗队在沙坪坝区嘉陵厂开展大规模武斗，双方参战均在700人以上，支援者上万。动用了枪炮、坦克。至13日夜，双方死伤上百人，经济损失357万元。（中共重庆市沙坪坝区党史研究室《中共重庆沙坪坝区党史大事记》第二集，1999年内部出版(渝内刊准印号：99-051)，第131页）8月14日，长安机器厂和三钢厂两派武斗组织在嘉陵江大桥发生大规模武斗，并猛烈炮击上清寺，打死11人，伤多人，烧毁房屋数幢。（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8月29日至31日，重庆市北碚地区造反派武斗人员2000余人冲进四〇四团营区，抢走枪支3000支，轻重机枪49挺，炮16门，枪弹16万发，手榴弹8000枚，打死指战员2人，抓走18人。（《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第100页）9月1日，周恩来听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汇报说到重庆一个工厂因武斗一夜打了一万发炮弹时，极为生气，说：这是国家财产，我是很痛心的。（《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第100页。梁兴初的汇报的数字可能有些夸张。据《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革命大批判发言之四·郭一民：愤怒揭发批判刘结挺、张西挺挑动群众斗群众，大搞武斗，大反人民解放军，营造独立王国的严重罪行》（中央学习班铅印材料）中说：“8月份重庆武斗升级，达到最高峰，一个月内打了一万多发炮弹。”郭一民曾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办事组组长。）

三、大规模的夺枪事件从江西开始

江西也是夺枪问题比较严重的省。据周恩来说，大规模抢（发）枪“是从江西开始的，影响到湖南，又影响到广州”。（1967年8月7日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时的讲话）据张春桥1967年9月28日接见江苏代表团时的讲话，江西全省当时共夺（发）枪7万多支，其中大多数是发的，少数是抢的，已收回的枪支有5万多支。（1967年9月28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3月以后，江西省造反派与支左解放军产生了矛盾。3月14日，江西省军区在省体育馆举行十万人大会，副参谋长周子韬在会上作《关于南昌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报告》，针对江西省夺权后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4月14日刘瑞森（支持造反派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等人指责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在4月20日造反派召开的“彻底批判周子韬‘三一四’黑报告会”上公开煽动、挑拨军队与群众组织的关系。4月23日，江西造反派头头万里浪等人组织造反派人员冲击省军区机关，轮番静坐绝食长达60余天。4月24日，江西省和南昌市造反派组织封闭了由军区军管的江西日报社。从5月1日起，以造反派组织名义出版《新华社电讯》。5月7日、17日，周恩来两次就江西日报问题致电江西省军区党委转江西省学生造反组织，要求立即从江西日报社撤出，让报社正常工作，但造反派组织拒不执行。5月16日，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筹”）成立。6月7日，省“大联筹”头头万里浪、陈全生、蔡方根等人策划绑架来江西参与领导江西省军区支左工作的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等人。这一行动受到了周恩来的严厉批评。

6月28日，江西农学院的造反派与南昌县莲塘镇对立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29日凌晨，省“大联筹”头头陈全生策划从江西省军区所属部队抢夺枪支弹药，组织6批武装人员赴莲塘参加武斗，造成严重流血事件。同日，赣州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流血事件。（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97、298、299页）莲塘的保守派得到宜春军分区和南昌县武装部的支持，在武斗中占据优势，造反派死亡十余人。赣州军分区和赣州市武装部给保守派“联络总站”发了枪，在武斗中“大联筹”派死伤惨重，事后查点，发现造反派尸体223具。（据《周总理第六次

接见江西四方代表座谈记录》(1967年8月5日)。另据“大联筹”1967年8月12日出版的《火线战报》说：“目前，据江西省大联合筹委会与广州部队新调赣州某部联合调查，已发现我造反派和红卫兵尸体490具(不包括江中打捞的)其中有223具已被认出来。”)

6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江西省军区转省“大联筹”电报指示：“立即停止夺枪的错误行动，退出军事机关，并将枪支弹药退还军区，退回原驻地，听候中央派员处理。”7月1日，周恩来等在京接见江西“大联筹”代表时指出，省“大联筹”夺枪是错误的，要及时制止武斗，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第299-300页)7月3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汇报江西情况。提请批准调二十六军一个师进驻江西支左和加强军管会及未来的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次日，毛泽东批：调一个师问题，待江西会议开得有点眉目再定为宜。(《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68页)7月4日，省军区发出《关于制止赣州武斗问题的命令》，责成赣州军分区和当地驻军采取有效措施，立即制止武斗。

8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认为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决定改组江西省军区，派遣济南军区、广州军区的部队进驻江西各地，任命程世清为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杨栋梁为省军区司令员，成立以程世清为主要负责人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532页)中央的一系列举措并未能平息江西的动乱。8月24日，江西抚州地区发生严重武斗事件，程世清等本着坚决支持左派的原则，派出支左部队前往介入。武斗中先后死亡干部群众65人。(《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第301页)

四、浙江的夺枪

1967年3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省军

区政委龙潜任主任，省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舟嵎要塞区政委曹思明、二十军政委南萍、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任副主任。军管会内部在支左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以南萍、陈励耘为首的二十军、空五军坚决支持“省联总”，而以龙潜为首的浙江省军区则比较支持“红暴派”。

5月9日，“省联总”组织数万人召开坚决击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大会，把斗争矛头指向了省军管会、省军区的主要领导人。6月11日至7月23日，中央召集浙江三军代表和“省联总”、“红暴”两派代表到北京开会。开会期间，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多次单独接见“省联总”代表，向“红暴”派和省军区施加压力。7月13日、23日，会议达成关于浙江问题的两个协议，肯定空五军、二十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指责以龙潜为首的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错误，责令他们深刻检查。同时提出要以“省联总”为主实现两派大联合。

“省联总”代表回杭以后，聚集各地的造反组织，多次召开大会，批判、挂牌游斗省军区政委龙潜、司令员张秀龙等，强迫龙潜检讨。

浙江温州地区存在着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工总司”（即温州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和“温联总”（即温州革命造反派联合总司令部）。6月下旬，“省联总”宣布吸收温州“工总司”为其下属组织。在“省联总”的支持、怂恿下，“工总司”与“温联总”两派之间的斗争日趋尖锐、激烈。7月10日，温州市区发生大规模武斗，两派分别占领市区各制高点，控制主要交通要道，武斗规模越来越大。7月21日，温州军分区所属6515部队6分队、防化连及军械库部分武器遭两大派组织抢夺。被抢武器中，除步枪、冲锋枪外，还有轻、重机枪，火焰喷射器和六〇炮、82炮、122榴弹炮等重武器。（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省温州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8月5日，“省联总”头头张永生等人唆使造反派千余人包围省军区军械二库，骗开大门，扣押和打伤守卫人员后，强行砸开仓库，将1000多件枪械和价值约40万元的军用物资洗劫一空。9日，张永生再次纠集千余人，又抢走省军区军械一库的汽车及子弹几百万发，手榴弹万余枚。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记载，5日和9日两次共抢走长短枪1900余支，轻重机枪523挺，炮40门，子

弹 120 万余发，手榴弹 1.69 万余枚。（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07-308 页）

8 月 22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决定》，任命二十军政委南萍为省军管会主任，任命二十军军长熊应堂为省军区代司令员，南萍为代政委。命令二十军进驻杭州，统一指挥省军区所属部队和地方武装，领导“三支两军”工作。23 日，省、市造反派和驻杭三军数万人集会，南萍和空五军军长白崇善在会上讲话，表示二十军、空五军坚决支持“省联总”为代表的造反派。26 日，省军区召开“交权”大会，龙潜、张秀龙、阮贤榜等省军区领导被造反派强按下跪，搞喷气式。会后，原省军区党委全体成员被关押和揪斗。省军区及其所属部队和军分区、人武部，甚至民兵连的广大干部战士，也被作为“龙子龙孙”，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被活活整死。（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第 157 页）

8 月下旬，“省联总”为了控制全省，以“文攻武卫”开路，在全省各地大规模武力镇压“红暴”派。24 日，“省联总”召开攻打萧山誓师大会。26 日凌晨，张永生、贺贤春组织省级机关和杭州市数十个单位经过军训的三四千人，全副武装攻打萧山。打死 90 多人，打伤 100 多人。萧山攻下后，二十军立即进驻军管。8 月 24 日，“省联总”部署所属组织，攻打富阳县城。富阳县城被打下之后，又制造了一系列武斗事件。10 月 3 日，“富联总”谎称县主要领导被龙门公社对立派所绑架，在得到省军管会负责人的支持后，富阳县造反派当晚组织攻打龙门公社。在攻打富阳县城和龙门公社等武斗中，打死 100 多人，伤残 300 多人，关押 700 多人，烧毁房屋 1200 多间，砸了 166 个单位和 2000 多间房屋。（《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大事记》第 155-158 页）

五、广西的夺枪

1967 年 4、5 月间，广西的群众组织围绕着干部问题分成了支持韦国清的“支韦派”和支持伍晋南的“支伍派”。“支伍派”于 4 月 22 日成立了“南宁四

二二火线指挥部”，后改为“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四二二”）；“支韦派”于5月25日成立了“五二五革命行动指挥部”，后改为“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广西的“四二二”和“联指”两大派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双方多次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7月13日，广西“联指”组织红卫兵到广西军区警卫连和区党校分部驻军6984部队抢走步枪、冲锋枪300余支、轻机枪3挺、60钢炮1门和一批弹药。8月18日晚，广西“四二二”头头经过策划，纠集了300人到金鸡村抢劫军用列车的援越炮弹4000多发。20日中央文革来电责令交还后，“四二二”才将炮弹大部分交还部队。8月20日晚，“四二二”南宁航运“工总”乘船到蒲庙抢夺邕宁县武装部枪支弹药。从8月到9月5日中央颁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即《九五命令》）前，全广西抢夺部队武器的有19个县、市。其中被“四二二”抢夺的有桂林、临桂、灵川、永福、平乐、兴安、资源、象州、宜山、横县等10个县、市；被“联指”抢夺的有阳朔、玉林、武鸣、扶绥等县；两派都抢夺的有南宁、邕宁、柳州、梧州、柳江等5个县。9月15日，南宁“联指”延安片总指挥同金光农场“联指”头头公开违抗中央《九五命令》，策划抢夺金光农场民兵武器。由南宁“红色公安”带领80多名武斗骨干，乘坐两辆汽车前往。共抢得苏式7.62步骑枪80支、轻机枪4挺、九二式重机枪1挺、五〇式冲锋枪50支。（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编写小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51、52页）此后广西武斗持续发展，越打越凶，夺枪事件越来越多，越来越大。1968年5月5日，广西“联指”总指挥部组织3800人，出动45辆汽车、一列火车客车，到南宁市长岗岭广西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装备，共抢走各种枪支7044支，其中轻机枪479挺，高射机枪48挺，六〇炮4门，炮弹60发，子弹120万发。5月10日，柳州“联指”抢走驻军6985部队和519部队各种枪支316支，子弹1万多发，六〇炮、迫击炮2门，四〇火箭筒2具。5月21日，柳州“四二二”派组织数千人到柳州火车站抢走准备援助越南的子弹11000多箱，共计1700多万发子弹。6月4日，广西“联指”所属组织3500人第二次到广西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共抢去各种枪支1859支，六〇炮8门，子弹100多万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

, 第 387 页)

六、云南的夺枪

云南省在 1967 年 3 月底实行军事管制以后，“八派”和“炮派”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斗争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日趋激烈。4 月 26 日，“炮派”召开大会，“八派”去冲击会场，在广场和东风路一带出现了数万人武斗的严重局面。5 月 29 日，两派又在军医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共有 100 多人受重伤，“炮派”的不少人被抓到“八派”的大本营昆明工学院私设的监狱非法关押。昆明地区的大规模武斗，引起了中央的关注。5 月 30 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电告昆明军区党委，要求对昆明地区两大派的武斗，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都不要介入，应该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劝说群众摆事实、讲道理，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逐步解决两派之间的问题，不要打击一方压制一方，使矛盾激化。（王元辅主编《云南五十年——中共云南省社会主义时期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2 页）

实际上，云南省的问题正是出在这个地方：军区介入了地方群众组织的矛盾斗争，在军管会内部就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两大派群众组织在军管会内都有人暗中支持。7 月下旬以后，云南武斗进一步严重升级。“八派”首开率领同伙夺枪先例。两大派的武斗从使用棍棒、梭标，发展到运用现代化武器进行枪战。8 月 23 日，“八派”庆祝“八二三”一周年游行之后，到支持本派的昆明步兵学校“抢”枪，用以武装“八管区”制高点。8 月 24 日，“炮派”得知消息后，也跑到小麦峪军械库去“抢”武器，装备驻守西站、云南大学、新华山等“炮管区”各制高点。两派形成军事割据。仅 1967 年 8 月至 12 月，两派抢枪 20 余次，共抢走部队、地方、民兵武器库枪支约 34857 件，弹药不计其数。

（王元辅主编《云南五十年——中共云南省社会主义时期大事记》第 132-133 页）据《云南省志·中共云南省委志》记载，在两大派和流散社会的各种枪支达 10 余万支之多。（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省志·中共云南省委志》下卷第 1071 页）

在昆明武斗严重升级的影响下，多数地州市与昆明两大派挂钩的造反派也相继发生严重武斗。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是重灾区。全州 8 个县都发生武斗，在武斗期间死亡达 2000 余人，伤残更多，是云南在武斗期间伤亡最多的一个州。

东川市的两派武斗，市武装部武器库中的枪支弹药被抢劫一空，东川矿务局副总军代表带领支左部队全副武装，在武斗动员大会上说：“全体造反派要紧急行动起来，有枪拿枪，无枪拿棍棒，没有棍棒拿石头，没有石头用嘴咬，要把矿区每一寸土地变为消灭‘炮匪’的坟墓。我们全体军代表和支左部队决心和造反派团结在一起，生在一起，死在一起。”东川支左部队于 1967 年 12 月 17 日夜间攻打石膏矿，打死睡梦中的职工十余人。全市武斗打死 124 人，厂矿企业全部停产。

曲靖地区的两派武斗导致专署公安处的仓库被砸开，各型枪支数百支、子弹数万发和收缴来的鸦片被抢走。五层楼的工农兵旅社被烧毁。

在大理白族自治州，驻滇西部队十四军军长梁中玉以“滇西支左委员会”的名义支一派、压一派。他把大理军分区的大多数干部定为“支保势力”，说大理军分区只有 3 个人是好的。1967 年 12 月 5 日，梁支持的一派 200 多人乘 6 辆卡车到十四军军部“抢枪”（发枪），首开大理地区抢枪之风。1968 年 1 月 10-13 日，还是这一派几百人去冲击大理军分区，撬开军械库、被装库、作战保密室，抢走武器、弹药、军用地图、文件资料，抄了军分区干部的宿舍，抢劫财物。（《云南省志·中共云南省委志》下卷第 1066-1068 页）

七、其他一些典型案例

湖南省武斗严重，夺枪事件时有发生。据“湘江风雷”负责人叶卫东 1967 年 7 月 26 日在北京大学“声援两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会”上的讲话说：“抢枪支的情况非常严重。……现在街上经常看到一个小孩肩上背着一支枪，手上提一支枪，腰上挎着一支枪。”从 7 月底到 8 月下旬，湖南省邵阳军分区、邵阳武装部大批武器弹药被抢。共计被抢走各种枪支 818 支，“六〇”、“八二”迫击炮 27 门，手榴弹 1 万多枚，子弹 250 万发。（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第 317 页）

1967年7月至9月，广东各地两派群众组织武斗事件迭起。7月23日，广州“东风派”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成立总部大会，而对立的“红旗派”组织则在越秀山体育场开会。中午，两派群众在纪念堂、吉祥路一带发生武斗，共聚集了2万余人。广州市军管会抽调21个连的解放军赶到武斗现场，在冲突的双方中间筑起人墙，才将事态控制住。此后，两派武斗不断升级，造反派开始抢夺当地驻军的枪支弹药，用来相互厮杀。8月5日深夜，广州两派群众组织冲进已实行军管的市公安局，捆绑起哨兵，打昏查哨的连长，砸开武器仓库大门，抢走各类枪支1850支，子弹数万发。8月8日晚，广州市郊区金鸡岭枪械库被抢；8月9日，广州市军管会遭冲击，被抢去一批枪支弹药。8月10-12日，广州警备区机关遭受群众组织8次冲击，被抢走一批枪支弹药和其他装备。（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卷十一，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

8月18日，广州地区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在长堤省总工会大楼发生武斗，枪战达4小时，双方共死亡3人，伤33人。19日零时，周恩来亲自从北京来电指示：立即停止武斗，撤出攻打省总工会的队伍。此后，武斗才逐渐宣告平息。8月22日，周恩来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广东赴京两派群众组织谈判代表，提出四项紧急措施：(1)各派组织立即停止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枪支弹药、物资装备、粮秣和车辆；(2)各派组织所持有的武器、弹药和车辆立即封存，准备交还解放军；(3)停止一切武斗，禁止打、砸、抢、抄、抓；(4)立即释放一切被扣人员。赴京的广东两派群众组织代表都表示同意和坚决执行。但是，冲突事件仍然不断发生，武斗仍未能得到制止。9月1日，周恩来等人再次接见广东两派，并重申了8月22日提出的四项紧急措施。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广东两派谈判代表在北京达成了停止武斗；无条件释放所抓人员；不准夺枪；将夺来的枪支归还给解放军等四项协议。9月15日，周恩来等人又一次接见广东两派代表，强调广东两派群众组织抢劫解放军的枪支必须在9月20日之前上缴完毕。（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东党史大事记》，2000年内部发行(粤准印字第0155号)，第315-316页）

东北地区的武斗也相当厉害。1967年8月11日，吉林“长春公社”袭击长

长春市英俊区(现二道河子区)武装部和长春拖拉机厂武装部，抢走大量武器。8月13日，“长春公社”派观点的驻长春军事院校联合“长春公社”数千人袭击解放军第5坦克学校军械库，将三个仓库的武器全部抢光，抢走大量枪支弹药，仅机枪就有170挺(其中有高射机枪50挺)。8月14日，“二总部”出动近千人，50多辆汽车，洗劫了解放军白老虎屯武器库。据不完全统计：从8月9日到8月14日的5天中，长春市就发生40多起抢夺部队及人武部门枪支弹药的事件。随后，全省各地县、各大厂矿等基层单位民兵的枪支相继被抢。在吉林省长春市的武斗中使用了坦克。1967年9月13日，长春市起重机厂等十多个单位的“二总部”组织的300多人，使用步枪、机枪、机炮、六〇炮、炸药包等武器袭击“长春公社”英俊区驻地吉林建筑一公司“小白楼”，双方发生激烈枪战，造成2人死亡。双方枪战过程中，驻长春军事院校公社派观点的组织出动4辆坦克增援“小白楼”。辽宁省的武斗也很普遍，据《中共辽宁党史大事记》里记载：辽宁9个市、地和2个铁路局后来共收缴各种枪支200916支。（高峰主编《中共辽宁党史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8月21日，中央军委总参作战部报告：停泊在厦门某地10艘军舰遭厦门群众组织袭扰，一些人不断地冲上舰去抢夺炮舰武器。今天又有港务局“新海员公社”11人冲上炮舰夺枪，后又有群众乘坐8艘机帆船追着军舰要夺枪，致使这10艘军舰不敢靠岸，被迫起锚在海里转圈。到下午5时20分，与一架从金门起飞前前侦察的国民党炮兵校正机发生遭遇战。周恩来获悉这一情况当即指示：“请伯达同志以中央文革或周恩来、陈伯达等人的名义宣布，不准夺炮艇的武器，在敌人面前夺野战军的武器是错误的。如劝告不听，继续再夺，即宣布为反革命。”当晚，中央文革办事组将周恩来的指示电告福州军区转厦门市各群众组织。（《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第四册，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4504页。另可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80-181页）

山西省的武斗在1967年太原“九·五”事件后开始使用现代化武器，后逐步升级。“从(1967年)11月起，迫击炮、无后坐力炮、地雷、火箭筒等杀伤力大的现代化武器便取代了土炮和冷兵器。整座大楼炸毁已不新鲜，死三五个人小冲突寻常得像刮一阵轻风。打到1968年初，杀伤力极强的卡秋莎火箭炮也

上阵了。”（《山西通史》第10卷，当代卷第466页）1967年12月起，山西各地不断有武器库被抢事件发生。山西省的武斗持续时间长，一直到1969年九大召开后还在继续。据1968年9月底统计，仅太原地区即收缴各种枪支2.9万枝，各种火炮1040门，手榴弹14.5万多枚，不同型号的炮弹、子弹149万多发，炸药3.3万多公斤。（《山西通史》第10卷，当代卷第472-473页）

八、全国夺枪总数近200万

以上所述，不过是全国各地夺枪情况的一些典型案例。夺枪现象极其普遍，尤其是1967年夏秋之际，达到高潮。全国没有夺枪的地方，只有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当时基本上没有夺枪的，仅内蒙古、河北、山东、山西、甘肃、青海等少数地区。其后，大多数地区逐步稳定了局面，制止了夺枪事件的泛滥，但在一些派性斗争激烈的地区，夺枪事件还时有发生。

夺枪的规模有多大？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在同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谈话中说：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100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下)《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72-1976)，第834-835页）

实际情况远远超过了毛泽东的估计。据不完全统计，到1967年8月19日止，全国共发生了1175起抢夺部队的武器、弹药的事件，共抢夺武器、弹药有：步枪2.16万余支、冲锋枪4600余支、手枪2000余支、其他枪2100余支、轻机枪1190余挺、重机枪350余挺、高射机枪78挺、六〇炮40门、迫击炮22门、火箭筒61具、无后坐力炮8门、子弹648.7万余发、弹药1296公斤、雷管4290余支、手榴弹16300余枚、喷火器10具、高射机枪子弹700发，湖南一个工厂28吨发射药、重庆一个兵工厂72万余发子弹被抢。（引自邓礼峰《“三支两军”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8卷第6期。其中数字有不准确之处，例如：“手榴弹16300余枚”，肯定大大低于实际数字（疑为163万余枚之误）。1967年8月5日和9日，浙江“省联总”的张永生等人抢劫省军区军械库，两

次共抢走手榴弹 1.69 万余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第 307-308 页)又据不完全统计，到 1969 年 9 月止，被抢的武器和收回武器的情况是：被抢夺的各种枪 1877216 万(支、挺)，收回 2131036(支、挺)；被抢夺的各种火炮 10266 门，收回火炮 14828 门；被抢夺的各种枪弹 44217 万发，收回枪弹 34004 万发；被抢夺的各种炮弹 390642 发，收回炮弹 294259 发；被抢夺的手榴弹 2719545 枚，收回手榴弹 2734381 枚(以上统计中，有的收缴数大于被抢数，是因为抢夺数中没有统计军工厂生产的新产品和群众组织自制的武器弹药)。(邓礼峰《“三支两军”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 年第 8 卷第 6 期)

九、“九五命令”

实际上，从“全面夺权”以来，全国的混乱局面愈演愈烈，到 1967 年 8 月下旬，局势的发展，已到了几乎失去控制的地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04 页)主持党和政府日常实际工作的周恩来对此忧心如焚，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我看派性现在已经登峰造极了，不能再往下发展了，再不回头，不管哪一方面，就要犯罪了。”(《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184 页)8 月 25 日凌晨，周恩来找杨成武谈话，讲了各省情况、王力 8 月 7 日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等事，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他要杨成武即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几天以后，毛泽东决定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

毛泽东一方面要搞“全面夺权”，另一方面，他也不希望全国的局面失去控制，在得到周恩来等的报告后，他也对当时全国局势的严重性有了新的认识。而且在前一阶段造反派与保守派斗争激烈的一些省份，如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省，在中央支持左派夺权方针的指导下，造反派的势力已经明显占据了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

令》（即“九五命令”）。

“九五命令”严令禁止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装备、器材、物资，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命令警告说：违犯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并强调：这种抢夺行为是反革命行动，解放军可采取措施对夺枪的少数坏头头和肇事凶手予以逮捕法办，遇到这些人拒捕和抵抗时，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反击。（《“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 561-562 页）

“九五命令”下达后，以及不久中央发出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谈话记录，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制止武斗、围剿派性，全国局势逐渐趋于缓和。造反派夺枪的事件大大减少，但局部地区的武斗和夺枪事件还是时有发生。一直到 1968 年 9 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后，全国局势才基本稳定下来，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大规模武斗和夺枪事件逐渐消失。

原载卜伟华博客。

【文摘】

陈伯达错捕王广宇

王保春 王文耀

1968 年 3 月 3 日的晚上，我们都吃完晚餐，回到了办公室，这时陈伯达也刚开完中央碰头会回来，他说许广平给主席、总理写了封信，说鲁迅先生的手稿被戚本禹从博物馆拿走了。总理看了这封信，信上说《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 15 页，还有书信手稿一千多封，一千五百多页，大部分都没有出版过。总理说得赶快找回来，这事得马上办。开完会已经 12 点多了，陈伯达让王保春给杨成武同志要了个电话，王保春用军用保密机不一会儿就接通了。杨成武也是刚散会后到的家。陈和杨通话，王保春在旁听着。陈说：鲁迅先生的

手稿被别人抄走了，现在找不到下落；许广平同志给主席、总理写信找这批稿子，你想办法布置一下，尽快把它追回来。

杨成武接完陈伯达的电话以后，就把这个任务布置给卫戍区的傅崇碧办。傅了解情况后，就几个方面同时动手找。中央文革小组也在查找之列，由于王、关、戚出了问题之后，中央文革办事组相关的人员都不可信任了，被抓的，被调回原单位的不少，新人业务互不衔接。查的结果有两个人值得怀疑，一个是原办事组的副组长王广宇被调回马列主义研究院去办学习班，另一个是原办事组档案室的韩书信，被调回四川。

一天晚上，天气挺冷，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突然来电话，让我们俩去十六楼中央文革所在地，他要去研究院，后来他又说让王保春一个人去就行了。王保春急忙到了十六楼，见到气氛紧张严肃，陈伯达只说去研究院，让王保春在前边带路，去干什么也没告诉他。一同去的还有杨成武、肖力等，他们没有去过研究院，让王保春和警卫处长邬吉成坐一辆伏尔加小车，在前边带路，他们有三四辆车跟在后边。很快就到了颐和园的拐弯路口，领路车停了下来，等后边的车跟上后，王保春下车告诉他们说到了。陈伯达说先找他们的负责人。王保春带他们进研究院的北门，然后到经常开会的二楼会议室，让他们坐下等着。王保春先去找了研究院勤务组的负责人宋士堂来，向宋介绍了几位首长。这时他们对老宋说，要找王广宇谈话。老宋很快就跑去把王广宇从睡梦中叫醒，他迷迷糊糊从床上爬起来，穿上棉衣、棉鞋，在宋士堂的催促下，慌忙去了会议室。

这个会议室一进门有个屏风，谈话前邬吉成从警卫角度出发，在屏风后边安排了两个战士，交代他们：你们俩就站在这把着别动，首长和他谈话，你们要注意首长安全。布置好以后，王保春走出来，陈伯达、杨成武、肖力等人和王广宇谈话。邬吉成和王保春在会议室外没有离开。王保春很警惕，因为他认识研究院的人，怕事后万一引起“走漏消息”的怪事，专案组找他的麻烦。这事之后江青曾专门找邬吉成打听：“那天晚上你们去研究院找王广宇谈话，你是否一直和王保春在一起？”老邬说：“是的，我们俩始终在一起。”陈伯达等对王广宇怎么谈的，不知道，可能就是问他鲁迅手稿的事。当时王广宇都懵了，他说他都不知道。谈了没多一会儿，约半个小时就出来了。陈伯达等出来

以后就要走，这时卫戍区有个参谋，不知是谁带去的，也可能事先通知他们去的，卫戍区还有两辆吉普车在那儿等着。这个参谋截住王保春：“咳，王秘书，对他采取什么规格？”这时王保春心想王广宇反正走不了啦，问那个参谋：都有什么规格？他说：有监护、拘留、逮捕，说了三四种。他们都快下楼梯了，王保春追上去，在下楼梯处截住陈伯达说：“伯达同志，卫戍区的同志问对他采取什么规格？”陈伯达愣了一下后问：“都有什么规格？”王保春照说了一遍。陈听了以后也拿不准，便转身和杨成武、肖力嘀咕了几句，过来对王保春说：“逮捕！逮捕！”王保春当即给卫戍区那个同志说，就按逮捕的规格吧。就这样把王广宇弄上吉普车给拉走了。

从研究院回来以后，陈伯达有点犯愁，琢磨自己是不是说的“逮捕”，便问王保春，王保春说是的，并且说这是不是重了些？陈伯达有点不安了，为了证明他的话，立即给杨成武打电话，但他又不好直接问，就先在电话里再三关照杨成武，一定要把鲁迅手稿找回来，这很重要，别让人给毁了等。最后顺便问杨“我们在研究院是说的将王广宇‘逮捕’吧？”杨肯定地说是“逮捕”。陈伯达挂上电话很不安地说：“是逮捕，这怎么办哪，能不能改一下？”后来在文革小组开会时，陈伯达提到这事，说自己说重了。江青马上站起来，脸一沉，回他一句：“怎么！抓你的人就不行吗？！”由于事情还没搞清楚，手稿还没找到，陈再不敢说话了。

另一个原中央文革管档案的韩书信，卫戍区说有事把他从四川用飞机接回北京，安排住在一个地方，不让他和外人接触，实际上实行了软禁。问他鲁迅手稿在哪里？此人说戚本禹拿回来交给他几箱，没有人动，就放在十六楼（中央文革）档案室的一个房子里。傅崇碧日夜寻找，这下知道了一个确切的信息，急速坐车奔钓鱼台，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傅崇碧武装冲钓鱼台闹剧。

王广宇三月份被关起来之后，再也无人过问，已经到了六月底，身上还穿着棉衣、棉裤、棉鞋。公安机关写报告问，这个人送来之后，从来没有人来审问过，不知是什么案子？他身体不好，有病，至今还穿着冬天的衣服。陈伯达也不敢过问，只让人给送了单衣，因为此案属江青管着。

直到我们被关押五年之后的1979年，我们因为自己的工作分配问题去上访中纪委，在谈完我们的事情之后，纪委的同志无意中问了一句：“有个叫王广

字的人，不知你们认识不认识，不知道因为什么事，被抓了起来一直关着，到现在也从来没有人管，我们放了吧？没有根据，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只知道他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过给关了起来了，具体犯什么事就不知道了。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只知道问过他鲁迅手稿在哪儿？他说他不知道。”我们告诉这位同志说，认识王广宇。王保春就把王广宇被抓起来的过程说了一遍。中纪委的同志高兴地说：“哎呀！可找到了，那你快把这个过程帮我们写个材料。”王保春很快写了个详细的过程，交给了中纪委，这才把王广宇给放了。（注：王广宇出狱为 1975 年 5 月。但一直未落实政策。此处所说的“放”，应是“落实政策”之误。）

原载《百年潮》2005 年第 12 期。

【小资料】

按：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历史系教授 Jeremy Brown（周杰荣）先生为本刊提供了他收藏的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名单（1967 年 12 月 21 日《冶金风雷》报）。本刊据其扫描件整理后，请余汝信先生做了修订补充。谨向周杰荣、余汝信深致谢忱。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名单

（1967 年 12 月 6 日成立）

主任——

解学恭，51 岁，山西人，原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天津市革委会筹备小组组长

副主任——

萧思明，52 岁，江西永新人，河北省军区原政委

郑三生，51岁，江西石城人，六十六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区司令员

江 枫，天津市公安局局长

常委——

杜文达，53岁，江西吉安人，六十六军原军长

杨银声（又作杨银生），49岁，安徽寿县人，六十六军政委

刘 政，六十六军副军长

王 一，天津警备区第一副司令员

王占瀛，原天津市副市长

王亢之，原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

范永中，原天津市人委副秘书长

冯玉田，棉纺二厂工人

白启荣，第五建筑公司工人

孙锡儒，天津制鞋厂车间副主任

张承明，反修锦纶厂工人

李荣贵，铁路分局调度所调度员

林启予，发电、桥修大队技术干部

李宝禄，通用公司干部

丁玉琪，天津市一商业局针织站业务员

翟殿柱，东郊区新立村四合庄大队党支部书记

王风春，南郊区北大村党支部书记

杨长俊，天津大学学生

于泽光，南开大学学生

张崇远，河北大学学生

任学明，十八中学生

侯振江，天津市公安局副处长

许光黎，体育学院教练员

巴木兰，原市委工交政治部干部

朱文田（不详）

蔺学成，体育学院学生

史津立（不详）

夏奎元，原天津市计委干部

注：据《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组织史资料（1921-1987）》（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1版）常委名单中有朱文田、史津立，无蔺学成、夏奎元；《冶金风雷》刊登的常委名单中有蔺学成、夏奎元，无朱文田、史津立。是当时公布的名单有误，还是后来进行了调整？本刊特将两个不同名单并列，望知情者说明。

委员——

朱玉学，55岁，湖北麻城人，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

朱 彪，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

杨 柱，海军司令部航保部副部长

王元和，天津警备区副政委

张逸群，河北省军区独二师师长

董献珍，北空副部长

李恩贵，炮五师五〇团政委

周建华，陆军第七十四师副参谋长

张旭之，北京军区后勤部八分部部长

乔喜增，陆军第一九六师五八八团副团长

韩德富，天津警备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秦胜云，空军高炮八师副师长

衣瑞伦，六十六军副参谋长

张 波，陆军第一九六师政委

费国柱，陆军第七十四师政委

姜精武，空军第七师副参谋长

郝志刚，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

王 培，七支局办公室主任

刘 忠，原天津市计委副主任

毛 平，原中共天津市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赵国祥，原市委财贸政治部主任

安淑静，第一毛纺厂党委副书记

何振武，机车车辆厂医务员
程国富，第一建筑公司汽车司机
赵春年，天津拖拉机厂工人
边树铭，天钢一分厂工人
王 勇，财贸粮食局粮库化验员
马俊澄，印刷一厂工人
张连友，卷烟厂干部
何光临，油漆厂技术员
宗耀东，大成五金厂技术干部
韩恩荣，六〇九厂干部
徐 信，汉沽化工厂工人
钟广斌，运输三厂司机
李 锡，塘沽运输公司干部
孔照文，塘沽区港务局运输工人
李向东，邮局十四局组长
王纶祥，化工局建设公司工程师
王宝平，天津灯泡厂工人
潘有才，二轻系统三条石老工人
王汉清，棉一老工人
谢宝才，水产系统老工人
文殿尊，塘沽区中新桥朝阳贫协主席
裴秀俊，汉沽区村茶淀公社政治干事
高仲贤，北大港区东风公社民兵连长
王泽民，北郊区小淀公社社员
李荣敏，西郊王文庄公社团支部书记
胡忠信，天津工学院学生
蒋 浩，南开大学学生
牛翠琴，女六中学生
李惠明，十六中学生

姜 洁，延安中学学生

郭长年，天津市劳动局第二半工半读中等学校学生

赵振强，天津日报印刷厂工人股股长

李瑞英，血研所门诊部副主任

孟建农，歌舞剧院演员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由 97 人组成（现 86 名，除暂缺“革命领导干部”6 名外，群众组织代表似应尚缺 5 名），常委 31 名（暂缺“革命领导干部”1 名）。全体委员中，军队干部 22 名，党政领导干部 18 名。据《冶金风雷》报编者按中介绍，委员中群众组织负责人有 57 名，占%59，其中工代会 32 名，农代会 7 名，大专 6 名，中学 5 名，一般干部 7 名。

【编读往来】

1、丁东赐函本刊，指出《记忆》八期所载《华国锋的功与过》一文，“提到 1977 年枪毙的思想犯时，有两个名字可能有误：李久莲应是李九莲，周海媛应是钟海源。”经查核，丁东是对的，特此更正，并向读者致歉。

2、袁伟时教授建议：为方便阅读，《记忆》的目录与正文采用超级链接。感谢袁先生的指点。本刊从本期开始照此办理。因电脑配置不同，有两种链接方法：一是读者点击目录上有下划线的作者名（凡无作者名之文如“小资料”等，则以文章标题作链接），页面即会直接翻到该篇正文；二是将鼠标移到目录上有下划线的作者名（或篇名）处，即会出现一提示：“按住 CTRL，并单击鼠标以跟踪链接。”请注意，不要单击鼠标右键，要单击其左键。特此知达。